

漫談 1624-1971 年間臺灣茶葉產業的發軔

林炳文*

摘 要

臺灣茶業發展至今逾三百年，是臺灣百姓傳統的飲品，它與來臺開墾漢人人文風俗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臺灣茶文化可說是閩南茶文化的延伸。荷蘭殖民當局為了開墾土地急需勞動力，1630 年代從福建、廣東招引漢人來臺發展農業，並引進新農作物，奠定今天臺灣人口結構與農業發展的基礎。本文先從先民發現臺灣及原生茶樹談起，再談福建移民攜帶武夷種的烏龍茶來臺灣種植始於 1805 年，後有安溪鐵觀音、青心烏龍茶苗與製茶工藝引進，此為臺灣烏龍茶之起源。1858 年臺灣開港通埠後，接觸世界貿易體系，進而帶動臺茶的發展；十九世紀中葉，洋行入駐使臺灣茶葉開始企業化生產，且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商品。在杜特與李春生合作下，1869 年開創臺灣烏龍茶直接外銷之路；1881 年引進包種茶製法，1886 年間劉銘傳巡撫來臺後，推動新政造就大稻埕茶產業國際化；後再經日本人歷年試驗與推廣獎勵烏龍茶品種種植，又大力推廣紅茶種植，讓臺灣茶葉朝多元化發展。1948 年在國民政府的輔導之下，臺灣茶園迅速復耕，茶廠恢復製造，出口又趨於活躍，外銷仍以紅茶為大宗，包種茶與綠茶的出口規模相對較小。1961 年以後，因印度、錫蘭、爪哇產製成本優勢，綠茶又成為臺茶出口的主力。1966 年臺灣茶葉出口量達一高峰，之後走下坡，1971 年為臺灣茶業發展的轉捩點。臺灣經歷了不同的時期，政府在茶葉產業發展扮演角色，也發展出不同類別的臺茶外銷到世界各地。在臺灣茶業發展史中，本文列舉七位茶葉名人的貢獻。回顧與展望臺茶發展，本文總結荷蘭殖民時期臺茶為萌芽期，明鄭時期臺茶為停頓期，清廷時期臺茶為發展期，日本殖民時期臺茶為蓬勃期，民國時期臺茶進入興盛期，至於臺灣步入工業化後臺茶為挑戰期。

關鍵字：福爾摩沙、荷蘭和平、媽振館、箱子館、葛雷欣法則

JEL 分類代號：L66, M20, N80, Q17

*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退休教授

「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沖澹閒潔，韻高致靜。」

宋徽宗 趙 佶(1082-1135) 大觀茶論(1107)

「清明穀雨，摘茶之候也。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

明朝茶文化學者許次紓(1549-1604) 茶疏(1597)

壹、前言

茶文化發源於中國秦、漢年代(西元前三世紀)，唐朝(西元 618-907)人文雅士開啟飲茶風氣興盛傳播到周邊地區，如日本、朝鮮等地。臺灣茶業發展至今逾三百年，是臺灣百姓傳統的飲品，它與來臺開墾漢人人文風俗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至於本文所述的茶葉產業係指茶農(茶葉栽種)、製茶廠(製茶)、茶商(配銷)等三個價值鏈活動，不包含茶葉加工或延伸產業(諸如茶飲料、茶食、茶餐廳等)。1966 年起臺灣工業產品出口值超越農產品，該年常被經濟學家認定為臺灣經濟起飛年(Taiwan's Economic take-off year)；翌年臺灣開始進口茶葉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該年又是臺茶輸出百年的轉折年。臺灣自從步入工業化後，由於農村勞動力外移、工資上漲等環境因素，致臺茶生產成本提高，除中國大陸外，茶葉持開放自由進口政策。依據農委會統計：臺灣茶葉每年消費量約 43,000 公噸，臺茶年產量約 14,000 公噸，其中出口 3,000 公噸，進口多達 32,000 公噸，¹市面上到處充斥著從越南、中國、斯里蘭卡、印尼、印度進口茶葉，故本文僅限縮在 1624-1971 年間。

一、發現臺灣

話說臺茶的發展史，我們要從早期漢人發現臺灣渡海抵臺的簡史談起。有關臺灣的最早記載，始於隋煬帝大業元年(605)海師何蠻奏以及唐初編撰的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條載。在隋朝滅亡後，有大量漢人與武賁郎將陳稜的舊部屬移流求。²到中唐時期，

¹ 紀文禮、張家樂等人，「臺灣人喝的茶有七成是進口茶。」聯合新聞網，2015/08/21。

網址：https://udn.com/upf/newmedia/2015_vist/08/20150821_tea_01/index.html 臺灣境內五星級酒店房間內置放的茶包，即有來自新加坡進口的高奢茶品牌 1837 TWG (The Wellness Group) 茶包。

² 在連橫台灣通史中記載：府城西定坊新街有陳稜之廟(將軍祠)，廟名開山宮，祂是明鄭王朝所建，以紀念陳稜將軍開台之功，奉為開山聖王。參見杜正勝，「流求與『流求論』。」臺灣史研究 第 29 卷 (2022 年 12 月)：頁 1-69。

施肩吾(號東齋, 780-861)³率領族人東渡海峽遷居澎湖列島, 成就「東齋開發澎湖第一人」。⁴宋孝宗乾道 7 年(1171), 泉州知州的汪大猷(1120-1200)調集土軍、水軍、及巡海禁軍擊退偷襲水澳、圍頭等沿海村莊的毗舍耶千餘人後, 在澎湖建造營房, 遣將屯兵戍守臺澎海疆, 正式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此後有相當多的漢人在澎湖列島生活, 還有人攜帶著先進的生產技術, 前往臺灣發展。南宋時期擁有一支龐大的帆船艦隊與商船隊伍, 其貿易路線遠至東亞、東南亞、及中東地區, 沿著這條海上絲綢之路, 將中國的陶瓷、絲綢、茶葉等商品銷往世界各地。⁵明朝(1368-1644)時期正值世界發生偉大的歷史變革, 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逐漸向資本主義過渡, 而明朝也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

二、漢人帶進品茗風氣 歐洲勢力擴及臺灣

明英宗正統 14 年(1499)土木堡之變被俘後, 國力由盛轉衰之際, 早期沿海的漢人移居臺灣,⁶也一併帶來品茗的風氣。不過, 此時的臺灣尚未步入開發, 經濟體系仍處原始, 並無可靠的信史記載當時的經貿情況, 島民與東亞沿岸的貿易往來, 也可能還處在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⁷

³ 杭州富陽鄉間一直流傳著三國時期孫權「東規夷洲」的故事。唐朝中葉著名詩人、道學家施肩吾(780-861), 字希聖, 入道後稱「棲真子」。「安史之亂」後, 盛唐式微, 東南沿海人民田園荒蕪, 為逃避戰亂, 身為孫權同鄉的施肩吾受到早年民間流傳故事鼓舞與啟示, 唐宣宗大中 13 年(859), 帶領族人及鄭仰一家, 由福建泉州港啟程航向澎湖, 不巧遇上颱風而返航, 第二次啟程, 終於成功帶領族人移居澎湖。

⁴ 在連橫 1920 年出版的《臺灣通史·卷一開闢紀》中記載:「及唐中葉, 施肩吾始率其族遷居澎湖。肩吾分水人, 元和進士, 隱居不仕, 有詩行世。」

⁵ 『東番記』記載:「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 居澎湖外洋海島中。」『東番記』是一篇十七世紀初記載臺灣地理與原住民的人事雜記, 原本認為它是明末福建莆田人周嬰所著, 後來 1950 年代考證實為明朝儒生陳第(1541-1617)敘述他在 1603 年隨沈有容(1557-1627)將軍渡輪前往當時被蔑稱為東番的臺灣, 攻剿海寇的經歷, 亦可能記載當時明海軍收集有關臺灣的情報。陳第為福州連江人, 這篇雜記是現存漢人最早親自來臺灣實地採訪, 對臺灣地形、港口、貿易、及原住民風俗記錄所留下的文獻。參見周婉窈, *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第三章「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平原的實地調查報告。」(頁 107-50)。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據明史記載: 臺灣北部的雞籠(今基隆), 又名東番, 聚落星散。

⁶ 大約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時代(1368-1644), 當時的中國常被移民者稱為「唐山」, 唐山的人民生活艱苦, 天災人禍不斷。一些人為了要生存, 要過較好的生活, 痛下決心離開唐山, 到嶄新的地方(南洋或臺灣)開闢新天地, 只是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他們以一種樂觀的態度來面對。臺灣在 1684 年納入清朝領土, 唐山漢人開始大量移民臺灣。不過, 後來清政府卻以治安的理由, 禁止唐山內地居民移民到臺灣。

⁷ 參見林滿紅,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 第二版。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8 年。林滿紅, 「海外貿易與臺北的崛起。」刊載于廖咸浩主編, *第二屆臺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17-36)。臺北: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2006 年。

直到十七世紀，西方人才真正認識到臺灣。1622 年荷蘭人與葡萄牙人爭奪澳門未果後，無意中發現澎湖群島及臺灣，「福爾摩沙」(Formosa)就此登上世界舞臺。⁸1626 年一批遠征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曾採取軍事與商業行動，期望與葡萄牙人合作，吸引中國人從事貿易活動，以制衡荷蘭勢力在東亞的擴張。⁹十九世紀時，羅伯特·蒙哥馬利·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 1802-1868)撰寫了一套兩冊的著作——*中國：政治、商業、及社會；向英國政府提交的正式報告*(*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s Government*)，書中記載著：臺灣(Tae-wan)是一片狹長的土地，其財富和樣貌媲美當時中國一流城市，當時英國人曾與福爾摩沙島上原住民的貿易接觸。島上出產各種穀物和水果，其中稻米、糖、菸草、及樟腦為主要的出口商品，一些質量優良的礦產(金、銀、朱砂、銅、及煤炭)出口到英國。¹⁰1670 年鄭經(1642-1681)為突破大清帝國的圍堵，尋求與西方國家結盟，曾力邀英國人在其領土上進行貿易，承諾免除港口或任何其他費用，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n Company，縮寫為 BEIC)¹¹從萬丹(Bantam)派遣艦隊抵達福爾摩沙，兩造議商合作條款，並準備下一回簽約。不過，

⁸ 1554 年葡萄牙繪圖師羅伯·歐蒙(Lopo Homem, 1497-1572)在其繪製的羅伯·歐蒙世界圖(*World Map of Lopo Homem*)上，首次出現將臺灣標誌為「福爾摩沙」。參見湯錦台，*大航海時代的臺灣*，最新增修版。臺北：如果出版社，2022 年，頁 45。

⁹ 1627 年來臺宣教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牧師，翌年寫下觀察報告書：「福爾摩沙島對話與簡短的故事」(“Discours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又譯「福爾摩沙志略」，呈給荷蘭東印度公司，這是一份十七世紀歐洲人對福爾摩沙原住民西拉雅族的既定印象與重要文獻。參見 Georgius Candidius, “Discours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 ondersocht ende beschreven door den Eerwaerdigen D. Georgius Candidius, dienaar des Heyligen Evangelium ende voortplanter der Christelijcke Religie op't selve Eylant. Sincan 27 December 1628.” In William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

¹⁰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London: J. Madden, 1847, pp.26-7.

網址：<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mdp.39015039582245&seq=62>

¹¹ 1599 年 9 月 22 日，一群 215 位倫敦商人聯合向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提出申請特許狀，組成一家對東方貿易的特許公司，藉以獲取來自東印度群島香料貿易的豐厚利益，打破葡萄牙與尼德蘭(荷蘭)兩國對東印度群島的壟斷。1600 年 12 月 31 日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憑藉龐大的私人軍隊和英國政府的支持，1715 年派遣兩艘商船前往亞洲，獲利良多，激發了商人遠航的熱情。根據統計 1718-1721 年間，至少有 15 艘商船前往東方，其中 1721 年的 6 艘商船有 3 艘前往中國，盈利相當可觀。英國東印度公司從 1757 年開始掠奪印度次大陸，通過香料、茶葉、紡織品、及鴉片的全球貿易賺取了數百萬美元，公司控制自己的殖民地領土，儼然成為國中之國。直到 1858 年政府撤銷腐敗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除股本外，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財產歸英國政府接管。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殖民帝國主義時期中持續最久之佼佼者。參見徐建，*往東方去——16-18 世紀德意志與東方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11。

1672 年 10 月 13 日兩造簽約時，鄭經卻要求加簽一些條件，需承諾增建一間工廠和廈門貿易。儘管有了邀請和承諾，且工廠跟倉庫都建置好，但鄭經很奸巧，行事作風極為蠻橫專斷，不僅壟斷糖和毛皮，還以不當方式徵收關稅，兩造的貿易合作遂告吹。

貳、臺茶發展的濫觴

一、航海時代的臺灣

接下來我們談談臺茶發展史。明太祖(1328-1398)於 1373 年發布詔令：設茶司馬一職專門司茶貿易事。1391 年再發布詔令：廢團茶，興葉茶。從此貢茶由團茶餅改為散葉茶(芽茶)，烹茶方法由煎煮改為沖泡，紅茶和花茶才發展出來。在明朝之前，中國生產的茶全為綠茶，而且為方便運送大多製成茶餅。後來，由於飲用習慣的改變，紅茶的發明及其生產方式解決了茶葉經由長途運送致使茶失去風味與香氣的問題，且逐漸廣為歐洲人接受。在波濤洶湧的大航海時代，海外貿易活動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賺大財，成就歐洲的海上霸權，吸引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的仿效，也紛紛到美洲、非洲、亞洲來尋找未開發的地區，以發展各自的殖民地。十七世紀初，資本主義在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戰爭歲月中發軔，從宗教和王權束縛中釋放出新興商業資本，追隨著葡萄牙、西班牙人海外擴張的腳步；1602 年成立了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縮寫為 VOC)，¹²1619 年荷屬東印度公司總督揚·彼得生·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 1587-1692)在爪哇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建立總部，摒除英國勢力，壟斷丁香貿易，逐步在亞洲建立從印尼到日本的商業王國。十七世紀初茶葉被帶進歐洲，最初僅是貴族社會的高級飲品，隨後傳遍世界成為日常必需品，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中國茶葉最大買主，清朝時期出口的茶葉為熙春茶(綠茶)、紅茶、以及易於保存的普洱茶。福建武夷山星村鎮桐木關正山小種紅茶獨具風味，遠銷英國，歐洲貴族最早稱武夷岩茶為 Bohea Tea。¹³

¹² 1595-1602 年間，荷蘭政府核准成立 14 家以東印度貿易為重點的公司，為避免商業過度競爭而合併成一家聯合公司：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她是第一個可以自組傭兵、發行貨幣，也是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她被批准與其他國家訂立正式條約，對該領地擁有實行殖民與統治的權力。十八世紀末，一方面因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所屬的印尼殖民地不斷發生動亂，商品供應量驟減，為了與英國競爭，不斷削價傾銷，造成公司利潤受損；另一方面又因荷蘭不斷與英、法兩國發生戰爭，公司與國家的關係糾纏不清，公司經常花費鉅額金錢和力量來支持政府，導致公司負債累累。1795 年荷蘭爆發革命，成立新政府。1798 年政府決定接管公司所有財產及債務，1800 年 1 月 1 日公司正式被迫解散，其領地和財產全數歸荷蘭新政府所有。

¹³ 「武夷」的閩南語讀音近似「Bohea」。參見 (1) 羅德里克·普塔克(Roderich Ptak)，「中國人、葡國人、和荷蘭人在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茶業貿易(1600-1750)。」《文化雜誌》第十八期 (1994 年 1 月)：頁 9-22。(2) 何

荷蘭東印度公司原先在澎湖附近活動，後在明朝政府阻擾之下，致使荷蘭人在 1624 年轉進到當時的臺灣大員(今臺南市)興築奧倫治城(Fort Oranje)，1627 年改名為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即今日的安平古堡，設立轉口貿易據點，¹⁴雖然荷蘭展開臺灣的殖民統治僅有三十八年(1624-1662)，但臺灣自此逐步進入世界貿易體系，為清領時期臺灣設關開埠奠定良好的基礎。這段歷史不僅豐富了臺灣的文化底蘊，也為臺灣與世界聯繫提供歷史脈絡，它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¹⁵

十七世紀的荷蘭掌握世界海上霸權，自 1636 年起，荷蘭人使用戎克船將中國茶葉輸入臺灣，再轉運到波斯、印度、巴達維亞等地，十七世紀中葉起，荷蘭積極從事茶葉貿易，臺灣在此過程中扮演中國茶葉轉運集散地角色。1640 年春天，荷蘭人與葡萄牙人激戰，佔領錫蘭的加勒古城(Fort Galle)，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打破葡萄牙人肉桂香料貿易壟斷局面，1669 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擁有超過 150 艘商船、40 艘戰艦、五萬名員工、及一萬名傭兵的軍隊，規模龐大建立亞洲國家貿易體系，公司貿易足跡延展到日本、朝鮮及中國。然而，隨著世界貿易發展，香料貿易重要性衰退，荷蘭人在東方濫用精力與國內歷經鬱金香狂熱，導致荷蘭國力中落。

二、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壟斷茶葉貿易

到了十八世紀初，茶葉貿易興起，航海大國競爭舞台逐漸東移。170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兩艘商船前往廣州貿易，其重要的採購任務除生絲外，還包含松羅、大珠茶、武夷茶等多類別茶葉；1705 年倫敦首次出現綠茶，為英國人知曉另一類別的中國茶。¹⁶自 171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廣州直接通商開埠後，情況就改觀了，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漸取代有「海上馬車伕」之稱荷蘭在海上主導貿易的霸權，壟斷與中國的茶葉貿易，¹⁷於是 1715 年起英國人從廈門茶葉運輸全部改為廣州。1719 年法國也跟著仿效成立印度和中國皇家公司(Compagnie Royale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從事茶葉轉口貿易。後來，英國東印度公司先將紅茶種植技術帶往殖民地印度，促使印度和錫蘭成為紅茶生產大國；

志峰、林浩鉅、何青儒，「臺灣茶葉產業結構與經營模式的轉變。」《北商學報》第 37 期 (2021 年 1 月)：頁 1-25。

¹⁴ 荷蘭佔領臺灣目的是為了取得對中國、日本、韓國、及東南亞據點的樞紐，並壟斷馬尼拉(西班牙殖民地)與中國間的貿易。

¹⁵ 參見湯錦台，*前揭書*，2022 年。

¹⁶ 參見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徐中約(Immanuel C. Y. Hsü, 1923-2005)所出版的鉅著——Immanuel C. 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48-9.

¹⁷ 參見江滢河，「奧斯坦德公司對華貿易初探。」《澳門理工學報》第 16 卷 (2013 年第 4 期)：頁 32-3。

接著東印度公司再以土地殖民、調動軍隊行使英國法律權利，以維護其茶葉的壟斷貿易。1796 年更以武力奪取錫蘭，1824 年英國兼併新加坡，1832 年新加坡成為海峽殖民地政府所在地，1837 年東印度公司把茶葉帶進新加坡，成為茶葉、香料、及奢華精品貿易進出口重要據點，史稱「入埠」歷史重要的一年。

英國人最早雖然是喝綠茶和烏龍茶系的武夷茶，但後來漸漸變成喝完全發酵的紅茶。英國人鍾愛飲茶，有晨茶、下午茶、及晚茶的習慣，她們對紅茶的喜愛，遠遠超過中國人，茶種包括英倫早餐茶(English breakfast tea)、至今有 106 年歷史英國亞曼(Ahmad)品牌的格雷伯爵茶(Earl Grey tea)、中國輸入的茉莉花茶(jasmine tea)、以及日本輸入的綠茶(Japan green tea)。至於英國常見的紅茶有單品產地茶(single origin tea)、混合茶(blended tea)、風味茶(flavored tea)三類。

三、臺灣原生種茶樹 民不諳製茶之法

臺灣早期先民已有採製野生茶的經驗，康熙 36 年(1697)據郁永河(1645-?)所撰 *蕃境補遺* 記載：「先民採栽其嫩芽製茶，具有降火去暑之作用。」*諸羅縣志*(1717 年)記載：「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脹。然路險，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又不諳製茶之法。若挾能製武夷諸品者，購土番採而造之，當香味益上矣。」¹⁸ *淡水廳志* 記載：「貓螺山產茶，性極寒，蕃不敢飲。」在康熙 61 年(1722)朱一貴(1690-1722)事件後，清廷檢討在臺施政措施，奏請派遣黃叔瓚(1666-1742)為首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¹⁹御史抵臺後巡行各地，考察攻守險隘、海道風信，著有 *臺海使槎錄*。²⁰該書詳細記錄臺灣山川地理、風土民俗，對臺灣原住民的樣貌描述，觀察入微，亦有漢人通事請原住民入山採茶焙製事宜記載。

¹⁸ 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編纂，周憲文編輯，*諸羅縣志·卷十二*。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17]，1962 年，頁 295。

¹⁹ 1722-1769 年間清廷曾設置臺灣的監察御史，為清朝監察機關官職，後來裁撤巡臺御史一職。

²⁰ 1722 年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瓚抵臺，1724 年離臺。黃叔瓚著有 *臺海使槎錄* 一書，分八卷，其中「赤崁筆談」(卷一至卷四)、「番俗六考」(卷五至卷七)、「番俗雜記」(卷八)，分類記述漢族人及各地生、熟番之生活記事，立下筆記文學之範式，另有「番社雜詠」24 首，收錄「番歌」，以漢字音記錄各社傳唱之歌謠，凡 34 首。

中國文化大學蘇孟淮教授推斷臺灣中南部山地的原生茶就是臺灣山茶(*Camellia formosensis*)，目前我們仍可以在南投、嘉義、高雄、屏東、臺東等中低海拔山區發現這種野生茶樹。²¹

四、臺灣茶樹的引進 傳習武夷製茶法

根據阿布列特·赫伯特(Albrecht Herport, 1641-1730)1669年出版*爪哇、福爾摩沙、印度、及錫蘭旅行記(Reise nach Java, Formosa, Vorder-Indien und Ceylon 1659-1668)*一書，²²載明1660-1662年間他在臺行旅中發現臺灣漢人、荷蘭人皆有飲熱茶的習慣，茶葉是中國茶，品茗方式為煎煮熱飲。清代臺灣文獻記載：雍正12年(1734)、乾隆9年(1744)、乾隆13年(1748)，均記載以茶葉餽贈原住民，或民間漢人與原住民以物易物的品項中包含茶葉；乾隆年間(1736-1799)，桃園龜山台地已有茶園；乾隆末年，隸淡水海防廳的深坑、木柵庄一帶丘陵地已有福建人租地種茶。根據*臺灣通史*(1918)記載：「嘉慶年間(1796-1820)有柯朝者歸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於桀魚坑，發育甚佳。既以茶籽二斗播之，收成亦豐，遂互相傳植，蓋臺北多雨，一年可收四季，春夏為盛。」²³十八世紀末，臺灣北部陸續有福建移民從武夷山引進茶樹，在淡水河及其支流新店溪、大漢溪、基隆河畔的丘陵地帶種植，焙製茶葉技術則來自福建武夷。相傳這是臺灣北部植茶之始，惟其確實的年代不詳，且正式的記載也不多，有明確植茶年代的公文書始登載於*深坑廳第二統計書*(1907)，載明早在1810年泉州井連侯、柯朝二氏攜武夷茶苗分別植於深坑廳土庫庄和瑞芳桀魚坑，不久栽培面積迅速擴及文山地區，最遠至桃園、新竹等地，這是漢人來臺植茶的記錄；另外，我們從一些臺灣早期的土地轉讓契約中，窺知地上物有關茶樹或生產茶葉的記錄；再從乾隆57年(1792)簽訂的兩筆土地買賣*土地契約書*及一則分家*契約書*中發現：木柵、南港、深坑地區有部分土地供作植茶用途之記載，顯示十八世紀早就有漢人移民在臺灣北部山區植茶，且分佈範圍甚廣。²⁴

²¹ 至於當今臺灣新的紅茶品種台茶十八號，市場名為「紅玉」，就是以父本臺灣原生山茶與母本緬甸大葉種茶葉雜交育種而成，紅玉茶色艷麗多嬌，頓時讓人以為臺灣原生茶重現。參見蘇夢淮、謝長富，「紅玉飄香——臺灣山茶。」*科學人* 第167期(2016年1月)：頁90-1。

網址：<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columns&id=2918>

²² Albrecht Herport, *Reise nach Java, Formosa, Vorder-Indien und Ceylon 1659-1668*.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Pub., 1669.

²³ 參見連橫，*臺灣通史* 卷二十七·農業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六年，頁654。

²⁴ 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收錄的古契約書照片推斷：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叔賁練賣出文山堡頭重溪福德坑種有茶樹的*土地契約書*，契約書上指的頭重溪福德坑可能位於木柵；另外有兩則契約書：詹澤惠賣出萬順

參、三百多年來臺灣茶業發展史

在探索臺灣原生種茶和漢人從福建引進茶樹來臺植茶的歷史後，接著，我們擬分別就近代不同政權治理臺灣時期臺灣茶產業文化三百多年來的演變過程，探討不同時期發展出不同類別的臺茶（烏龍茶、包種茶、紅茶、綠茶），外銷到世界各地。

一、荷蘭治臺時期(The Dutch Colonial Rule, 1624-1662)

早在大航海時代，歐洲強權紛紛前來東亞從事貿易，並建立殖民地。在 1568-1648 年間，荷蘭人歷經八十年戰爭後脫離西班牙，建立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起步較晚的荷蘭人為了能夠建立跟明朝、日本貿易的據點，在明天啟 2 年(1622)，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總督揚·彼得生·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 1587-1692)派任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en)為荷蘭艦隊司令出征澳門，兩造在澳門外海激戰三天，遭到葡萄牙人頑強抵抗，葡萄牙以少擊多大敗荷蘭；然作戰任務失利後，奉令將殘餘兵力帶往澎湖，聘請澎湖漁夫嚮導，前往打狗(高雄)、大員(臺南)勘查地形；在馬公建置風櫃尾荷蘭城堡，以作為貿易據點，堡內設有司令官駐所和營舍。翌年雷爾生前往福州與福建巡撫商周祚協議，²⁵兩造達成「停火一年」、「荷方必須撤出澎湖」、「同意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明國領土以外的大員(臺灣本島)和明朝政府進行貿易」等協議後，隨即派遣士兵和奴工前往大員海灣入口沙洲興建城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貿易帝國，而臺灣正好處於東亞貿易路線戰略位置上，在明朝禁止外國人於中國領土上進行貿易活動的政策下，1624 年荷蘭遂撤出澎湖，浩浩蕩蕩前往大員，佔領臺灣。從此，臺灣的鹿皮、鹿脯、及砂糖成為荷蘭人在大員的主要貿易品。在荷蘭治臺時期，起初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無意在臺灣建立殖民統治，然而在 1630 年取得武力後盾之後，公司政策改弦易轍，其駐臺首長頭銜為「長官」，以熱蘭遮城為貿易與統治中心，隸屬巴達維亞的總督，殖民統治南臺灣前後達三十八年，不過其影響力遍及臺灣中部與南部沿海，可謂荷蘭東印度公司波瀾壯闊始於斯。

西班牙人於 1626 年佔領臺灣北部，後來卻因日本實施鎖國政策貿易受挫，遂於 1642 年撤離臺灣。荷蘭治臺時期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跟原住民相處，起初荷蘭東印度公司試圖以武力征服原住民，後來改變策略開始跟原住民貿易與傳教方式來影響；1635 年

寮種有茶樹的土地契約書；土地位於文山堡的胡家三兄弟分家產契約書中胡伯彬分得崙頭的茶園。參見(1)劉澤民，「臺灣何時開始種茶？」臺灣文獻 別冊 第 6 集，2003 年，頁 3-13。(2)劉澤民，「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談臺灣最早種茶的年代與地點。」悅讀檔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年。網址：<http://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4/116>

²⁵ 參見林逸帆，「從明末荷蘭俘虜交涉看中荷關係。」史耘 第十四期 (2010 年 6 月)：頁 103-123。

起荷蘭東印度公司治理原住民採地方會議制，建立從屬關係，1644 年起荷蘭殖民當局實行村社承包制度——荷蘭語稱為贖社(*t' Verpachten van Dorpen*)，將轄下原住民村舍交易權公開招標，商人得標後可壟斷村社所有交易。²⁶荷蘭人為了增加在臺灣的人口，當局鼓勵荷蘭男性與在地女性通婚，為臺灣社會增添了多元色彩。荷蘭人留下的歐洲建築遺產除了安平古堡外，還有 1655 年建造完成的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俗稱赤崁樓)；也有些地名可能來自荷蘭語，例如鵝鑾鼻地名由來，眾說紛紜，但有一說鵝鑾鼻有可能來自荷蘭語「油燈」(*olielampi*)；又如新北「富基」漁港、「富貴角」兩者同源自荷蘭語霍克(Hoeck)。臺灣原住民首度經歷被殖民脈絡的「文明化歷程」，再以「懲罰式征討」介入原住民部落爭戰，築構以公司為領主與原住民封臣的聯盟體制，以臺灣西南部平原為核心地區，拓展聯盟與征討，開創了所謂的「荷蘭和平」(*Pax Neerlandica*)。²⁷

十七世紀初期茶葉被帶入歐洲，當時荷蘭與葡萄牙都與中國有著海上貿易，起初她們是從事絲綢、棉緞、及香料貿易，後來才開啟茶葉貿易。在荷蘭人據臺以前，臺灣未有嚴格定義的漢人移民，大多數是來自中國東南沿海漢人，從事捕魚、交易生活用品、或是從事轉口貿易、或是海上有武裝勢力亦商亦盜的海商。²⁸當 1624 年荷蘭登陸臺灣時，島上漢人已有飲茶、或以茶葉作為藥材習慣，雖已有原生種茶樹，但未採茶焙製精茶；而荷蘭人以大員(今安平)為港口，進行茶葉貿易，僅把臺灣當成明朝茶葉的轉口貿易基地，惟當時明朝實施海禁，一些私販或公販從福州等地將茶葉輸出到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除需要一部份供當地員工消費，待剩餘的部份運送到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總部後，尚須再扣一部份供當地荷蘭人飲用，最終不是轉口荷蘭與歐洲各地，就是轉口到波斯、印度等地區。然茶葉輸出量杯水車薪，荷蘭當局改弦易轍開墾土地急需勞動力，1630 年代起從福建、廣東招引漢人來臺發展農業(稻米、茶葉、及蔗糖)，²⁹對臺灣作系統性開發，引進新的農作物，諸如豌豆(閩南語荷蘭豆，*hoo-lian-taū*)、馬鈴薯(荷蘭薯，*hō-lân-tsî*)、蕃茄(荷蘭語 *tomaat*)、蓮霧(印、馬地區叫 *jambu*，與閩南語接近)、印度檬果(土芒果)、番荔枝(釋迦)、玉米(番麥)、蕃芥蘭、波羅蜜、中南美番石榴、楊桃、羅勒、茴香等農作物，還引進對臺灣農業產生巨大影響的黃牛和種植技術，由漢人負責種植作物，原住民負責打獵、荷蘭人負責收購；另外，荷蘭人還留下紅毛井、紅毛埤、王田等農業開墾史

²⁶ 參見吳聰敏，「荷蘭統治時期之贖社制度。」《臺灣史研究》第十五卷(2008 年 3 月)：頁 1-29。

²⁷ 邱馨慧，「貿易、傳教與殖民『文明化歷程』——荷蘭的福爾摩沙。」《數位典藏 Blog Collection Room 2012/4/5》。網址：<https://content.teldap.tw/index/blog/?p=3583>

²⁸ 在十七世紀初大明海禁政策下，海上不乏擁有強大武裝船隊，其中代表性人物有李旦(? -1625)、顏思齊(1586-1625)、鄭芝龍(1604-1661)三人。

²⁹ 這一政策對臺灣影響深遠，它奠定了今天臺灣人口結構的基礎。

蹟，也帶進令當時臺灣人震驚的清潔用品肥皂(鄰近法國的荷蘭人肥皂稱 *savon*，閩南語雪文，*sap-būn*)、以及黏著劑水泥(閩南語紅毛塗)，對臺灣經濟與產業發展建樹良多。儘管當年荷蘭招募的漢人不過萬餘人，但已足夠其經濟發展所需，臺灣經濟就在荷、漢相互依存之下快速成長，形成所謂的共構殖民時期。³⁰臺灣民間計算土地面積，大片農地都以「甲」計算，即是沿用荷蘭舊制度，荷蘭的農地稱為 *akker*，臺灣人取尾音 *ker* 唸成甲(*ka*)，惟今日荷蘭已改為十進位制。在荷蘭治臺期間，她們建立一個複雜的貿易網絡，將中國、日本、東南亞與臺灣連結起來，臺灣生產的蔗糖、稻米、鹿皮輸往各地，³¹來自各地的商品也匯聚到臺灣。總的來說，荷蘭殖民時期為荷、漢共構殖民時期，引進漢人來臺開墾，不只開創「荷蘭和平」，亦拓展臺灣農業經濟範疇。

二、明鄭治臺時期(The Cheng Regime, 1661-1683)

國姓爺鄭成功(1624-1662)崛起於福建沿海，為荷蘭人創建的荷、漢共構殖民地帶來新的變數。鄭成功出兵應天府(南京)失利後，1661年4月決定經澎湖進攻臺灣，自鹿耳門登陸，5月底將荷軍圍困於熱蘭遮城內，荷軍大敗，死傷慘重，鄭氏將赤崁定為東都明京，於普羅民遮城設承天府衙門，改大員為安平鎮，翌年再攻下熱蘭遮城，2月1日荷蘭簽署降書，9日荷蘭人返回巴達維亞，結束了荷蘭在臺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易手東寧王朝鄭氏統治臺灣二十一年(1661-1683)，歷經鄭成功、鄭經、及鄭克塽三世統治，1683年明鄭政權亡，施琅(1621-1696)佔領臺灣。

明鄭統治期間一直奉南明為正朔，實施軍屯制，由軍隊開墾土地從事農耕，農暇時進行軍事訓練，戰爭上戰場，達到「寓兵於農」的目的。清朝政府基本上是壓制明鄭政權，且嚴禁與外人互市，致使當時臺灣成為中國商品的集散地。由於當時與中國的貿易只能從廈門走私為之，控制制海權的明鄭政權分東、西洋兩線船隊跟外國進行貿易往來，前者與日本貿易，後者與暹羅、呂宋貿易，遍及南洋各地。遠在1661年鄭成功光復臺灣之前，臺灣中南部之植茶就有史實考據，惟僅供臺灣島內居民自用為主。由於明鄭治臺的時間不長，在反清復明大業領軍之下，臺灣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有臺灣出產的蔗糖、鹿皮、稻米，以及自中國轉銷的絲綢、中藥材，以換取日本的軍用物資(諸如：銅、鉛、鑄

³⁰ 參見吳聰敏，「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看荷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經營之績效。」《經濟論文叢刊》44卷(2016年9月)：頁379-412。

³¹ 適值日本處於戰國時期，連年征戰，需要大量的武士鎧甲，而當時臺灣一年賣十幾萬張鹿皮到日本，鹿皮用途就是作為鎧甲外套的「陣羽織」。

鋼砲兵器、盔甲)和永曆錢幣的進口。因清廷為了對付明鄭海軍，嚴格實施海禁管制，致使當時從福建沿海的茶葉除了走私外，轉口貿易幾乎完全停止。

三、清廷治臺時期(The Ch'ing Regime, 1683-1895)

1683 年九月鄭克塽出降，明鄭政權結束，臺灣正式納入大清帝國版圖，政治中心移至府城內。翌年清廷雖在臺灣設置行政區和地方政府，但仍採鎖國政策，切斷臺灣與外界的貿易管道，還頒布渡臺禁令。康熙 36 年(1697)，臺灣中南部海拔 800 尺至 5,000 尺(240 公尺至 1,500 公尺)之山地有野生茶樹生長，附近住民將其幼芽以簡單方法製成茶作為自家之用。康熙 62 年(1723)，*赤崁筆談*載曰：「水沙連(今南投縣埔里、魚池、竹山、濁水溪流域的統稱)在深谷中，眾木蔽蔭，露霧密濛，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茶樹色綠為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有效。每年通事與蕃議定日期，入山焙製。」這些利用原生種臺灣山茶生產的茶葉，主要供內銷而無出口，甚至被當成藥用。³²以此觀之，臺灣人早已利用山茶焙製茶葉，也懂得利用茶籽榨油。嘉慶 10 年(1805)，福建移民攜帶一批武夷種的烏龍茶來臺種植，植於北部地區三角湧、阿四坑、八角湖山坡地。嘉慶 15 年(1810)，福建泉州府安溪井連侯傳入樹苗，植於今深坑土庫村山坡地，後再傳入附近丘陵台地，茶產業逐漸興盛。福建安溪最具盛名的「鐵觀音」，安溪移民精湛的製茶工藝也跟著引入臺灣，因此，臺灣茶文化可說是閩南茶文化的延伸。

據朱利葉斯·克拉普羅特(Julius von Klaproth, 1783-1835)以法文撰寫出版亞洲有關的回憶錄：對東方人民的歷史、地理、及語言學研究(*Mémoires relatifs a l'Asie, contenant d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et philologiques sur les peuples de l'Orient.*)³³一書中載曰：1824 年福爾摩沙就已經有輸出一些數量茶葉到中國的紀錄。清道光年間(1820-1850)，臺灣雖已經大面積種茶，且開始製茶供本地消費，但礙於清廷規定無法直接輸出，臺製毛茶(粗製茶)必需先送往福州加工才能出口；易言之，當時清廷反對擴大華洋貿易，使得臺茶的發展十分有限，只能以混福建茶方式出口。值得一提的是，咸豐 5 年(1855)，沙連保粗坑庄人氏的林鳳池(1819-1867)舉人從武夷山引進三十六株青心烏龍茶苗，其中有十二株移植在今鹿谷凍頂村，製茶技術源自閩南，此為臺灣烏龍茶之起源，由此得知鹿谷茶葉貿易並非倚賴開港通商而興起，臺茶發展伊始，製茶種

³² 陳右人，*台北市茶園有機化栽培潛力評估*。臺北：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研究報告，1987 年。

³³ Julius von Klaproth, *Mémoires relatifs a l'Asie, contenant d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et philologiques sur les peuples de l'Orient*. Paris: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1824.

類僅臺灣獨特烏龍茶一品種而已。初期清廷官府擬闢便道芻議未果，先民尋徑入山植茶，後循便道翻山越嶺，經坪林尾、石碇、深坑、六張犁等節點抵達大稻埕，沿途的深坑、石碇、坪林等茶鄉，此便道乃先民以茶葉維生與經濟往來之徑，故此一淡蘭古道南段定位為茶道。³⁴

(一)開港通商 闢建茶道

咸豐 8 年(1858)英法聯軍後簽訂天津條約，臺灣設置淡水關(滬尾、雞籠合稱)和臺灣關(打狗、安平合稱)，一共開放四個國際口岸，外商陸續來臺設立洋行，爾後臺茶才首次接觸到世界貿易體系，從而帶動臺茶的發展。1862 年滬尾新闢設立海關關署、碼頭區有洋樓宇、倉庫，開關徵稅管理外國貿易，隨後成立雞籠、安平、及打狗分關。³⁵1861-1875 年間是臺灣茶葉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咸豐以前，臺茶出口茶名都以地名標示，清同治 5 年(1865)，臺茶始有正式國際貿易出口紀錄，根據當時淡水海關紀錄：臺茶出口量已有 82 公噸多，臺灣區茶葉輸出業同業公會定之為臺茶出口元年，³⁶且有記載臺茶銷往美國的出口貿易量記錄，³⁷在海關報告中出現重要出口商品烏龍茶，這顯示當時臺茶品項特色的轉變。在此經濟動力影響下，促成臺灣巡撫劉銘傳(1836-1896)在光緒 11 年(1885)依循淡蘭古道南段山徑闢建茶道通宜蘭。道光年間(1782-1850)臺灣茶葉的產能，已漸漸擴大到可以回銷中國，只是那時臺茶大多以走私、混茶方式移進廈門、福州再進行混茶組合。

(二)清末北臺灣商人領袖：約翰·杜特

自道光 22-23 年間(1842-3)大清帝國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與虎門條約後，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自廈門成為通商口岸貿易大興，洋商與傳教士紛至沓來，茶葉在臺灣已經開始企業化生產，且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商品。1860 年來自英格蘭的約翰·杜特(John Dodd, 1838-1907)搭乘帆船初訪臺灣，後因家事返回英國，1864 年再以甸特洋行(Dent & Co.)首任代理商身分抵淡水，進口鴉片與布匹，出口樟腦。

³⁴ 參見陳右人，「臺灣茶文化探源——茶的引進與北臺灣早期茶路徑。」《當季專題》，2019 年。網址：[A0469ff7-3757-4ed6-aae7-af3199f597ee.pdf](https://doi.org/10.1016/j.a0469ff7-3757-4ed6-aae7-af3199f597ee.pdf)

³⁵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商業版圖擴及臺灣，1863 年在滬尾紅毛城設領事館，同領西方各國領事業務，此時英商已掌控滬尾港的經貿與航運。

³⁶ 穆道朗，*臺茶輸出百年簡史*。臺北：臺灣茶輸出業同業公會，1965 年。

³⁷ 臺茶的出口量遲至 1865 年才在滬尾港海關留下記錄，數量約為 82 公噸多。1869 年增加為 200 多公噸，其中有 127.86 公噸臺茶被英商約翰·杜特銷往紐約。參見林滿紅，*前揭書*，2018 年。

1865 年清廷下令規定外商除淡水與雞籠外，不得停靠其他港口，樟腦貿易大受影響，於是杜特拜訪 1860-1866 年間曾擔任英國駐臺副領事的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探詢在淡水經營樟腦貿易的可行性，³⁸當年李春生與杜特同行來北臺灣，一面費心安排杜特住處及辦公處所外，一面準備臺灣樟腦的採購及出口；在陪同杜特視察生產樟腦的樟樹途中，無意間發現南港仔庄、三角湧(三峽)、及大崙崁(大溪)有農戶種植少許茶樹的茶田，兩人慧眼識出臺灣土壤、氣候具有發展茶業潛力。同治 6 年(1867)甸特洋行倒閉，³⁹杜特在滬尾創設寶順洋行(Dodd & Co.)，一方面收購臺灣烏龍茶銷往澳門獲利頗豐，另一方面向福建購買大批茶苗，向香港上海滙豐銀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 Ltd.)貸款，鼓勵臺灣茶農擴大種植茶樹，以約定價格收購；1868 年率先在艋舺創設精製茶廠，引進福州、廈門技工精製烏龍茶，收購供應外銷的茗茶，使得臺灣茶葉生產大躍進，對臺灣茶業發展貢獻非凡。李春生負責輔導農民栽種茶樹，收成後由杜特全數收購，推動臺灣展開精製茶事業。無心插柳柳成陰，東西方兩人合作讓原本粗製臺茶變成精製茶，自此不再運到福州精製處理，開創臺灣烏龍茶直接外銷之路，讓特選臺灣烏龍茶(Extra Choicest Formosa Oolong Tea)通稱為「福爾摩沙烏龍茶」(Formosa Ooloong Tea)⁴⁰享譽世界，兩人成為臺茶產業發展與外銷的重要推手。雖然杜特只是一名居住在淡水河畔的洋商，但也代表著臺灣本土韌性產業的先驅者。⁴¹

³⁸ 1838 年 10 月 25 日約翰·杜特出生於英格蘭蘭開夏郡普雷斯頓，1859 年正值英國工業革命興盛期，十二歲的他卻心懷壯志啟程香港，投靠約翰·甸特(John Dent)創立的甸特洋行，從事樟腦、鴉片走私貿易。適逢太平天國之亂(1859-1864)，同治三年(1864)清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加強取締臺灣走私，杜特以甸特洋行代理商身分抵臺，在臺經營達 25 年。參見(1)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Hong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88. (2) Niki J. P. Alsford, *The Witnessed Account of British Resident John Dodd at Tamsu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10. [中譯本，杜特(John Dodd)著，歐尼基(Niki J. P. Alsford)編著，王若萱、李鎧揚、魏逸瑩、黃瀛任等人合譯，*寶順洋行：杜特在淡水的見證*。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22 年，頁 5-8。]

³⁹ 1832 年成立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與甸特洋行(中國文獻稱顛地洋行)在貿易上爭奪戰不休，政治上前者支持輝格黨，後者支持托利黨；自 1960 年代臺灣開港後，兩造的競爭更是激烈。參見(1)Weng Eang Cheong(張榮祥), *Mandarins and Merchants: Jardine Matheson & Co., 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Curzon Press Ltd., 1979, p.87. (2)Yen-p'ing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318. [中譯本，郝延平(Yen-p'ing Hao)，*中國近代商業革命*。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87 年，頁 356。]

⁴⁰ 當時特選臺灣烏龍茶有茶中香檳的雅稱，至於“Formosa Ooloong”非指單一品牌烏龍茶，而是臺茶統稱，例如德記洋行(Tait & Co.)就有使用鳳梨、盾牌、鼎鐘不同圖案包裝商標，各家洋行自行繪製不同圖案為商標代表，即使同一家洋行所販售不同等級的茶，甚至會以不同的標籤紙做識別。

⁴¹ 參見杜特(John Dodd)著，歐尼基(Niki J. P. Alsford)編著，*前揭書*，2022 年，頁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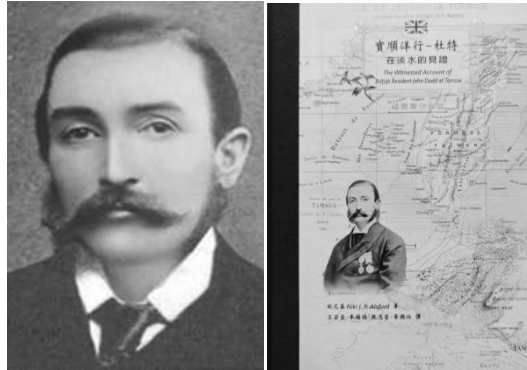


圖 1 臺灣烏龍茶之父：約翰·杜特

圖片來源：<https://www.google.com/search?q=約翰杜特>

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改變了臺茶的命運，杜特與李春生合作僱用兩艘大型飛剪式帆船，裝載 2,131 擔(約 127.86 公噸)烏龍茶，浩浩蕩蕩地從臺灣運往美國紐約，嘉評如潮。翌年杜特喜獲一筆 1,001.5 公噸烏龍茶外銷紐約的大訂單，需要更大的工坊，故決定由艋舺改到大稻埕發展精製茶廠；此際臺茶聲譽如日中天，一年之間臺灣烏龍茶價格由每擔十五元暴漲為每擔三十元。然而，當杜特的臺茶在美國取得成功後，引起華、洋商的覬覦，杜特與怡和洋行商量對策，洋商只能以鴉片來交換茶業，隔年 4 月清廷突徵茶釐，儘管稅率不高，但仍引發業者們抗爭，拒絕運茶外銷，甚至煽動地方角頭聚眾作亂，短期間對臺茶產生不小的影響；茶釐事件後不久，杜特的大稻埕茶廠慘遭祝融之災，損失慘重；同年茶販因茶釐抬高茶價，杜特和其他洋行則以拒買迫使茶販業者降價，造成茶價極不穩定。1872 年艋舺地區發生排洋事件，杜特與其他洋商紛紛轉進大稻埕，同年又有茶販為壓低成本，在特級臺茶中混摻劣茶，成高價劣質化的臺茶，導致美商拒買臺茶，直至 1873 年臺灣獨特之烏龍茶都處於滯銷狀態，又值美國遭逢「1873 年恐慌」；由於臺灣烏龍茶主要市場就在美國，且新興茶葉產區崛起大量輸入美國市場，造成茶價大跌，大稻埕茶商為因應此一困境，茶商不得已將滯銷的烏龍茶送至福州薰花改製為茉莉花茶出售，因禍得福大受歡迎創造出新的商機。在這段期間，臺茶貿易由洋商、買辦、茶販、茶戶以協議方式決定茶葉價格和產量，形成協議式產銷體系。1890 年 3 月 3 日杜特離臺返回英國定居於英格蘭威爾斯邊界施洛普郡(Shropshire)阿恰姆(Atcham)的鄉間村落，1907 年 7 月 15 日在北威爾斯觀光勝地崔菲爾(Trefriw)過世，享年 69 歲。⁴²

⁴² 杜特離臺時雖帶走一萬英鎊個人財產，但留給淡水無法計數的無形資產。同前註，頁 27。

(三)大稻埕的興起

咸豐元年(1851)林藍田為了逃避海盜搶劫，舉家由雞籠移居大稻埕⁴³，在當時中街(今迪化街)建造三棟閩南式街屋，為中街「頭炭店」最早的三間店鋪(店號「林益順」)，咸豐 3 年(1853)同來自泉州府的三邑與同安人，因宗教信仰及搶奪艋舺碼頭的經濟利益，發生頂郊三邑人和下郊同安人拚械鬥，由郊商領袖林右藻帶領同安人、安溪人、及漳州人從艋舺大量移入大龍峒和大稻埕，⁴⁴後來，林右藻在中街建立以販賣南北貨為主「復源」、「復振」、「復興」三家店鋪，成為中藥材、南北貨、及民生相關行業的重心，再加上洋商、華商推動，茶葉生意蒸蒸日上；後來艋舺港日漸淤淺，大稻埕港逐漸取而代之，⁴⁵大稻埕商埠的興起逐漸成為北臺灣商貿中心。當時茶農須先把毛茶送到大稻埕，再經烘焙、拼配等精緻步驟才能販售，大大小小的茶行一度多達一、兩百家，茶行收購粗茶，加工成精製茶業，再裝箱賣給洋行，北臺灣的茶產業大興。1872 年美國廢止進口茶業稅，來自各方的茶葉湧入美國市場，在李春生協助五大洋行，於 1874 年再次將福爾摩沙烏龍茶銷往美國，載譽而歸，因烏龍茶獨特風味，五大洋行⁴⁶爭購臺灣烏龍茶。美國博物學家約瑟夫·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在 1870 年完成博士學位後，展開一次為期十八個月旅行廣泛蒐集資料，1873 年來到臺灣曾赴淡水寶順洋行參觀，目睹畫師在茶箱包裝紙上繪製商標、寫上商行、及標示品名的榮景。1874 年臺灣第一家在南投凍頂山上成功種植烏龍茶的山記茶舍，茶湯入口雖微澀，但喉間回甘，名聲傳遍大街小巷。⁴⁷至今茶韻猶存於臺北街頭十大百年老茶莊：曉陽茶行(1842)、福大同茶莊(1845)、王德傳茶莊(1862)、全祥茶莊(1872)、林華泰茶行(1883)、峰圓茶莊(1883)、有記名茶(1890)、臺灣之寶·承園名茶(1907)、長順茶行(1907)、祥泰茶莊(1921)，秉持傳承關懷，寄與愛茶人士。⁴⁸

⁴³ 大稻埕原為巴賽族圭武卒社的所在地，咸豐年間漢人始至此地開發，因居民在此設立公共的曝稻大埕，收成時供稻米曬穀，平時則為農產品交易場所，故名曰大稻埕。

⁴⁴ 咸豐九年(1859)又因土地問題發生範圍廣大的漳泉械鬥，直至同治元年(1862)始告結束，參見徐逸鴻，*圖說清代台北城*，二版。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20 年，頁 50。

⁴⁵ 參見連橫，*臺灣通史* 卷二十七。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⁴⁶ 同治年間滬尾港與安平港開埠，外商紛紛來臺開設洋行，從事商務貿易，至 1872 年全盛時期共有英商德記洋行、怡記洋行(Elles & Co.)、和記洋行(Boyd & Co.)、水陸洋行(Brown & Co.)、及寶順洋行五大洋行進駐大稻埕。參見中譯本，約翰·杜特(John Dodd)著，陳政三譯述，*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 年。

⁴⁷ 蔣經國(1910-1988)總統曾三顧茅廬，品茗烘培三十年之久的烏金茶。參見林芳儀，「山記茶舍 烘出頂級老茶。」*天下雜誌* 321 期 2011 年 4 月 28 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010746>

⁴⁸ 除了峰圓、有記茶莊創立於廈門，曉陽茶行發跡於鹿港，王德傳茶莊創立於臺南府城，承園、長順茶行創立於南投外，福大同茶莊創設於艋舺，祥泰茶莊建立於坪林，其餘兩家百年老茶莊則原由林火樹兄弟創設

1875 年木柵樟湖地區栽種安溪鐵觀音茶，屏東恆春也開始種茶；同年清廷因日軍侵臺牡丹社事件而實施「開山撫番」，解除臺灣封山令，開啟臺茶墾殖的無限商機，促使福建茶商，特別是廈門茶販大舉來臺，讓華商實力大大凌駕於英商；另外，從 1877 年杜特在大嵵崁一帶進行準印度式茶園試驗和 1878 年杜特地產被法拍兩事件，前者係在美商提議支持下進行以期提升臺茶有效管理，後者卻是英商對杜特經營的不信任，我們不難發現美商塞繆爾·羅素(Samuel Russell)創辦於廣州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與英商怡和洋行在臺茶的競爭角力。⁴⁹ 1880 年臺灣烏龍茶產量達 5,428.533 公噸，取代福建省成為第一。⁵⁰ 光緒 7 年(1881)，有來自福建之同安吳福源氏，在臺北開設「源隆號」茶廠，引進安溪縣製茶專家王義程創製的包種茶製法，⁵¹並將俗稱「種籽」的好品種青心烏龍製成烏龍茶再加以薰花改製，同一年，福建茶商渡海來臺引入精製薰花技術，因而帶動臺灣茶業大量栽植香花作物，以配合薰花茶葉的產銷。

(四)茶葉貿易建築

大稻埕出現許多與茶產業息息相關的建築物，如茶棧、精製茶館、洋行等。所謂茶棧就是存放毛茶的倉庫，茶農或茶販先將毛茶運到茶棧存放待進行交易後，再運到精製茶館；精製茶館分生產烏龍茶的「蕃莊」和生產包種茶的「鋪家」，另外還有許多以廈門茶販經營的箱子館(packers)，兼辦採茶、精製、封裝臺茶、以及製造各類茶箱等工作，再販售給專營茶葉出口的洋行；在箱子館背後，還有廈門買辦為主的媽振館，⁵²兩者具有相互依存關係。現在洋行建築幾乎不存在了，我們只能從文獻與老照片資料得知，洋行多半高兩層樓，一樓作倉庫用途，二樓為辦公室，外圍一圈迴廊，立面作半圓拱，類似「陽台殖民地」樣式，⁵³騎樓(verandahs，俗稱亭仔腳)為其特色景象。

的「石碇茶葉組合」分家出來，在林氏茶業全盛時期，茶葉曾銷售至大連與天津等地，是最早經營海峽兩岸茶葉貿易的茶商。

⁴⁹ 參見黃頌文，「杜特之首創臺茶精製廠與華洋競合背後的英美角力(1865-187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紀要，2023/3/14。網址：https://mingqing.sinica.edu.tw.mvc>friendly_print

⁵⁰ 參見池上麻由子(Ikegami Mayuko)著，連雪雅譯述，*窮究台灣茶：如何選購、享受台灣茶*。臺北：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87。

⁵¹ 福建安溪茶商王義程創製的包種茶製法，係用四方形毛邊紙包裝，外面蓋上茶名與行號，然後運往福州加實香花(包花茶)出售，故原名「包種籽茶」簡稱為「包種茶」。

⁵² 媽振館一詞源自英文 merchant 的音譯，其背後是由廈門的匯豐銀行提供資金，主要負責在臺對茶葉生產、貿易作放款與匯兌業務，且提供資金給箱子館。

⁵³ 這是英國殖民印度、東南亞等地，為了適應當地氣候而發展出來的建築樣式。參見徐逸鴻，*前揭書*，頁 69，77。

依據臺灣通史記載：婦女在茶葉工廠撿茶梗與篩茶葉，一日可得數百錢；⁵⁴臺北市誌記載：臺北當時有印度保全，每日拿著竹竿，引導甚至半強迫路過婦女進茶廠工作，撿茶女坐滿貴德街的騎樓(亭仔腳)，撥弄著堆滿茶葉的筴笠，挑除毛茶的茶枝跟壞葉。⁵⁵從這兩項記載可以看出當時集散出口地大稻埕的繁榮景象，群聚不少的西方洋行、漢人商號，茶葉產業批發買賣成為大稻埕代表性的商業活動。⁵⁶洋商經營烏龍茶銷往美國，華商則在烏龍茶滯銷時生產包種茶外銷，受到南洋僑民歡迎，為茶葉外銷揭開序幕。在與杜特合作的過程中，李春生獲得許多國際貿易的寶貴竅門，也分享極高的紅利，奠定爾後他獨力創業的財務基礎。更值得一提的是，兩位異鄉人一前一後來到臺灣從事經貿活動，卻開創了一段福爾摩沙茶飄香全球、造就北臺灣茶葉加工製造及外銷重要根據地大稻埕商業興盛繁榮的歷史，兩人同被歐美人士尊稱為「臺灣烏龍茶之父」。

(五)魏靜時：臺灣包種茶之父

1885 年福建安溪的魏靜時(1853-1929)、王水錦二氏相繼來臺，在臺北七星區南港大坑地區(今舊莊里)適合發展茶業，引進福建安溪包種茶在該處種植，並悉心從事臺茶研究，尋求改良傳統包種茶製法；魏靜時自創以不薰花加工處理，改良製造出來的高品質包種茶亦能飄逸花香，其新穎製法烘培出茶葉外觀為長條的「龍形」，緊捲綳曲，發酵較輕，茶湯呈蜜綠色，花香清新怡人，通稱為「南港式製茶法」；王水錦也改良傳統武夷茶製茶方式製造出種籽茶，高發酵、重烘培、茶色水紅、甘而熟香。魏、王二氏新穎製茶法備受肯定，地方茶農爭相效法學習，為臺灣開創精製包種茶之先河，南港成為包種茶研製的重鎮。臺茶生態變化進入第三代，出現了民間俚語：「臺灣真是好所在，樹葉也會出花香。」魏靜時被尊稱為臺灣包種茶之父。⁵⁷令人惋惜的是，日本平鎮茶業試驗所將王水錦改良自傳統武夷烏龍的製法，稱為「文山式製茶法」，王水錦在 72 歲後不幸失明，其熟香味甘的「文山式製法包種茶」因而失傳。

依據日本外務省通商局的統計資料：觀察 1887-1891 年間美東茶葉市場產地市場佔有率排名，日本茶市場佔有率居首約 49.91%~55.11%，其次是大清帝國綠茶市場佔有率約 16.97%~18.43%，而臺灣茶市場佔有率約 15.7%~18.75%。雖然臺灣烏龍茶在美東茶葉

⁵⁴ 參見連橫，臺灣通史 卷三十六。南投市：臺灣通史社，1918 年。

⁵⁵ 參見黃耀鏘，臺北市志 卷六·經濟志·農林漁礦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5 年，頁 33-4。

⁵⁶ 參見陳右人，「臺灣茶業之回顧與展望。」園藝產業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專集(頁 127-46)。臺北：臺大園藝系，2006 年。

⁵⁷ 日本昭和天皇特頒授魏靜時「白櫻花狀」以『臺茶之父』褒揚，尊稱為臺灣包種茶之父。

市場佔有率不是所有產地中最高，但臺灣烏龍茶葉平均價格卻是三地中最高，不愧為當時國際茶葉市場中之「逸品」。⁵⁸

四、日本殖民治臺時期(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光緒 21 年(1895)簽訂馬關條約，大清帝國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正式進入日本殖民時期。殖民當局推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主要目標是以臺灣農產品滿足日本本土的需求，把臺灣視為日本工業產品的市場。治臺的規劃跟清廷時期相比，較具長遠性與計畫性，當局認清臺茶經濟價值及其重要性，著重在既有基礎上，先後更頒布「臺灣製茶稅則」、「臺灣製茶稅則施行細則」、「臺灣茶業取締規則」、「臺灣茶檢查規則」等規定，一方面為了臺茶之發展，訓令公布特許清朝製茶工人來臺事宜，以建立品牌形象，進一步提升臺茶的附加價值；另一方面為了穩定殖民統治，嚴格核發廈門、福州製茶工渡臺許可證，直至 1904 年才重新檢視華工政策。明治 36 年(1903)於桃園廳草湳坡(今平鎮區)設置製茶試驗場，後改為茶樹栽培試驗場，嘗試改良製茶、品種、及栽培技術，引進新型製茶機械；大正 10 年(1921)茶樹栽培試驗場更名中央研究所平鎮茶葉試驗支所；1923 年設置臺灣茶檢查所，建立出口茶檢驗制度，以控管茶葉出口之品質；昭和 5 年(1930)設置茶葉傳習所，培養茶業相關人才。日治時期最盛時全臺茶樹栽種面積約為 45,000 公頃。⁵⁹二十世紀交迭之際，包種茶生產地區多隸屬臺北州文山郡管轄，統稱為「文山包種茶」，茶葉除原本從福建傳入的品種外，又經日本人歷年試驗，委由平鎮茶業試驗所挑選出青心烏龍、青心大有、大葉烏龍、及硬枝紅心等四大品種推廣獎勵種植。後來，日本再大力改推廣紅茶種植，讓 Formosa Tea/Formosa Black Tea 國際化，外銷歐美各地，據傳原生的臺灣山茶，日據時代曾為貢品，茶業為當時臺灣的重要產業，約有三十萬人以茶維生。⁶⁰

1889 年所成立的茶郊永和興，本意圖業者和親共益，然 1895 年臺灣改隸日本殖民統治後，內部常見滋事紛擾案例，當局在明治 31 年(1897)下令茶郊永和興(烏龍茶業者的進出口同業公會)與舖家金協和(包種茶業者的進出口同業公會)合併改組為「臺北茶商公會」，並進行幹部改選以厲行規約；大正 4 年(1915)律令改組為「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

⁵⁸ 參見張遵倩，「清末臺灣茶葉的發展。」《德霖學報》24 (2010 年 8 月)：頁 295-318。

⁵⁹ 參見穆道朗，*臺茶輸出百年簡史*。臺北：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1965 年。許書維整理之悅讀檔案。網址：<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59/798>

⁶⁰ 史釋、陳永盛、楊宗國、石振原、廖增祿等人，「臺灣南投野生茶樹調查報告(1)。」《臺灣農業季刊》第八卷 (1972 年 12 月)：頁 193-201。

昭和 12 年(1937)再度改組為「同業組合臺灣茶商公會」，成為名符其實的全臺茶業公會；昭和 19 年(1944)又改組為「臺灣茶商公會」刪除同業組合四個字。民國 34 年(1945)8 月，日本戰敗，臺灣地區由國民政府接管，同年 12 月 29 日改組為「臺灣省茶葉商業同業公會」，會務照舊，惟公會不再辦理茶葉檢查工作，改由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檢驗局辦理。

臺茶自 1869 年開拓海外市場以來，興盛將近三十年。1899 年殖民當局臺北海山區與新竹大西區大規模開拓茶園，改創設紅茶工廠。1900 年臺灣茶參加巴黎博覽會，獲得金獎榮耀。1901 年文山與桃園地區設置茶樹栽培試驗所，1903 年安平鎮(桃園廳竹北二堡草湳陂庄)設置製茶試驗場，為當時最新式半機械製茶廠，配合機械製茶需要，銅鑼圈庄設置茶樹栽培試驗場。在清末臺灣茶葉生產，有一品種茶葉相當引人注目，那就是三峽出產的龍井茶，它屬於綠茶類，初仿中國十大名茶之首的西湖龍井茶，經多年研發後紅遍一時，具有色綠、香郁、味醇、形美四絕佳茗之譽，曾列臺灣十大名茶之一。1911 年臺灣烏龍茶出口量創往昔最高紀錄，達 9,270.8 公噸，1914 年日本當局將茶業列為臺灣重要保護產業，推行十年茶業獎勵計畫，1914 年臺灣包種茶在南洋三寶壟爪哇博覽會獲得榮譽獎，1915 年臺灣包種茶和烏龍茶分別榮獲巴拿馬運河開通紀念博覽會金牌和特等兩項殊榮。日本當局為提升臺灣製茶技術，大正 5 年(1916)在王水錦力薦下，魏靜時以茶農身分受聘為茶葉製造講師。1919 年臺灣始製綠茶供應出口，1933 年綠茶出口量達巔峰。在各廳農會獎勵下，1920 年代起臺茶逐漸脫離傳統純手工的製茶法，1922 年臺北茶商公會舉辦製茶品評會，期冀業者切磋觀摩技術，品評會成為日後舉辦活動的典範。1925 年包種茶出口量 4,740 公噸，已接近烏龍茶 4,830 公噸，不少茶農捨烏龍茶改製包種茶，不適合製造包種茶的品種(如黃柑茶)用來製造烏龍茶，致使烏龍茶品質降低，流失不少客戶。翌年臺灣包種茶的出口量與烏龍茶相當，此際當局改變政策，引進阿薩姆紅茶試種成功，培育新品種茶樹，期使臺茶更富多元的色彩。1928 年臺灣將紅茶以“Formosa Black Tea”為名銷往倫敦、紐約等地。1929 年在平鎮設茶葉指導所，翌年在桃園林口頭湖村設茶葉傳習所，培育茶業人才；1931 年臺灣紅茶產量增加，1934 年已超越烏龍茶產量，紅茶與包種茶、烏龍茶各佔臺茶出口量的三分之一，1937 年紅茶出口量達巔峰 5,800 公噸佔臺茶出口量 52%；1935 年設置魚池紅茶試驗支所，1939 年平鎮茶葉試驗支所改制為農業試驗所平鎮茶葉試驗支所。

在日本殖民初期，規劃臺北新市區，逐步拆除城牆、填平護城河，只留下四座城門，鄰近大稻埕港埠，改稱「港町」。天不從人願，大稻埕商業逐漸式微，因港仔溝淤淺無法行船，改為地下排水系統，地上成為西寧北路；隨後將原本路幅不及三公尺的延平北路拓寬成目前寬度，致使原本為主要幹道的貴德街與迪化街商業開始沒落；茶行與茶廠也漸漸向民生西路、重慶北路、及寧夏路轉移。1910 年代起，大稻埕配合日本政府市區改

正計畫，道路取直拓寬道路兩側房屋的外觀從樸實閩南式店鋪面，逐漸改成 1920 年代華麗的巴洛克裝飾，形成今日所見的建築面貌。

1913 年茶商王芳群因泉州府安溪縣嶢陽村家鄉治安敗壞，攜妻小舉家來臺落腳大稻埕，先擔任珍春茶行製茶師，後與王珍春合夥經營芳春茶行外銷包種茶到東南亞，再自立經營新芳春茶行，1932 年兒子王連河接手後改組合資會社新芳春茶行，外銷包種茶到泰國為其主力；1934 年竣工的新芳春茶行(今民生西路 309 號)⁶¹可說是大稻埕茶商王連河隨父親來臺發展的起家厝，它是一間混合東西方特色的住商混合洋樓，一樓為茶行、帳房、茶葉加工與倉庫，二樓為撿茶區、茶葉儲存區、及辦公室，三樓為神明廳和起居住宅，為現今少數完整保存的宏偉茶葉貿易建築，更是臺灣重要的文化資產與記憶。

(一)李春生：跨海奇航、樓宇煥彩、榮神益人

道光 18 年(1838)李春生(1838-1924)出生於泉州府同安縣廈門，幼年與鄰童共攜水果沿街叫賣，雖曾入私塾就學，然因家貧而輟學。咸豐元年(1851)，十四歲的李春生隨父在廈門竹樹腳禮拜堂，由蘇格蘭新教傳教士亞歷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 1800-1879)領洗，進入教會後，他勤奮學習英文和漢文典籍，成就日後華、洋之間的溝通橋梁。1855 年因太平天國之亂，廣州貿易式微，外商始在福建創立茶葉收購制，福建茶貿易隨之興起。1857 年聰敏勤奮的他年方十九，進入英商和記洋行(F. D. Syme & Co. 後改名為 Boyd & Co.)任職，從事洋貨與茶葉貿易的買辦(comprador, 洋行經紀人)。⁶²四年後李春生累積了人生第一桶創業金，在廈門開辦四達商行創業，從事進出口貿易；不幸 1864 年太平天國之亂蔓延到廈門，貿易生意因而停頓。幸好他所熟識的怡記洋行(Elles & Co.)老闆詹姆斯·艾利士(James C. Elles)出手相助，僱他前往臺灣收購樟腦，隔年又介紹他認識來自英格蘭的約翰·杜特，⁶³懂得洋文的他受聘為杜特公司買辦，若能順利擴大雇主業務，買辦亦可獲得豐厚報酬，李春生就是循此模式開創爾後自己的茶業外銷事業。⁶⁴

⁶¹ 曾效力於俊國、興農、誠泰、統一四支球隊的中華職棒投手王傳家為新芳春茶行第四代成員。

⁶² 買辦必需深諳當地語言、文化、及人脈，了解產業和雇主的外語，買辦和外商之間是一種互惠關係，絕非單純的僱傭關係。參見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 (2013 年 6 月)：頁 31-76。

⁶³ 杜特曾因腳傷而需拄柺杖，綽號三腳仔。

⁶⁴ 參見 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64-5.

同治 4 年(1865)同安縣志載曰：「先是，英人杜特以淡水之地宜茶，勸農栽種，教以焙製之法。以是臺北之茶聞內外，春生實輔佐之。」依此佐證李春生與杜特推廣北臺灣茶區安溪茶種栽植、負責貸資、設廠、及生產業務，這一段合作因緣成就他來臺發展的契機。⁶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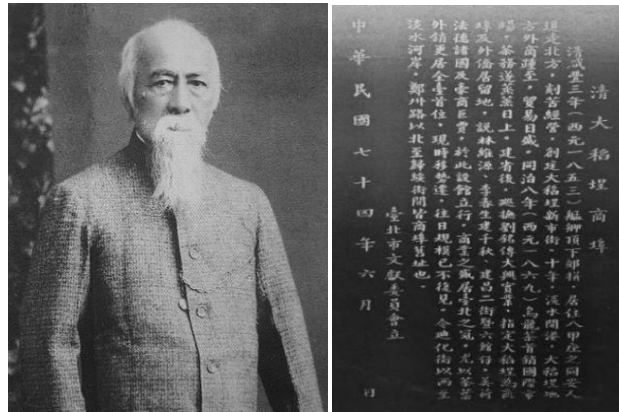


圖 2 清大稻埕商埠石碑與臺灣烏龍茶之父：李春生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李春生>

在 1860-70 年代，臺灣歷經羅發號(Rover)事件、樟腦糾紛、大南澳事件、牡丹社事件，引發美、英、日派兵來犯。臺灣海防欽差大臣沈葆楨(1820-1879)建議加強對臺灣的統治，光緒元年(1875)奏准設立臺北府，李春生擔任臺灣茶業顧問，四年後臺北正式開府並著手整建臺北城之際，他也積極參與督造臺北城。光緒 10 年(1884)因中法在北圻(越南北部)權益爭端，法國要脅佔領臺灣，⁶⁶法國出兵攻打雞隆和滬尾，清廷於 1884 年 6 月授與前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1836-1896)巡撫頭銜，命其負責臺灣的行政與軍務。7 月劉銘傳抵達臺灣，鑑於北部遭受法軍攻擊的情勢，親自駐守臺北。劉銘傳以武職身分加福建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曾向清廷建議臺灣與福建分離治理未被採納，翌年 7 月欽差大臣左宗棠(1812-1885)再奏請臺灣建省之議，1886 年閩浙總督楊昌濬(1825-1897)和福建臺

⁶⁵ 參見陳嘉式，「李春生傳略：一段幾乎被遺忘的台灣歷史人物。」太平洋時報 2013 年 1 月 4 日。網址：<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Li/Li,CSeng/biog/Tan,Ksek.htm>

⁶⁶ 參見杜特(John Dodd)著，歐尼基(Niki J. P. Alsford)編著，「北福爾摩沙封鎖日誌：1884-1885。」(頁 45-225)，前揭書，2022 年。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是一家在滬尾開港時期因茶業興盛而獨攬其利的英商船運公司，當 1884 年 10 月 2 日法軍砲打滬尾時，得忌利士洋行臨時充當外僑避難所，1885 年 6 月法軍撤兵才結束這場中法戰爭。

灣巡撫劉銘傳商議規劃分省事務，翌年臺灣完成省籍行政官署組織，始正式升格為「臺灣省」，劉銘傳被委任為首任臺灣巡撫。

劉銘傳巡撫來臺後，1886 年間推動新政與若干措施：「招撫生番、清除內患、墾殖番地、擴張疆域」，(1) 將淡水河岸規劃為大稻埕商埠和外僑居留區，大力推動大稻埕商埠商務，以順利推展臺灣茶葉出口貿易。(2) 設法將外國領事館集中管理，敦請林維源(1838-1905)、⁶⁷李春生等地方仕紳在一條 1895 年之前衍生的南北向小運河(當地人稱港仔溝)與淡水河之間(今西寧北路至環河北路之間)，開闢建昌街(貴德街北段)與千秋街(貴德街南段)劃歸為法、德、美、荷蘭等國領事館，1892 年興建六間相連的欽差行館，當地人稱六館仔。⁶⁸隨後，茶商開始進駐六館街(今塔城街至環河北路的南京西路)、及貴德街以北的區域，很多茶廠與房舍前門位於貴德街，後門臨建昌街以東南北向小運河，以便利營商，小運河將此區與漢人街市隔絕開來，正好符合當時「華洋分居」的想法。當時大稻埕港口商埠繁榮景象：小運河上小船川流不息，白天小運河兩側茶葉商行忙碌地裝卸貨，晚上下班後，熙熙攘攘人潮流連忘返於茶行間的歐式建築庭園，燈火通明，宴會、文藝活動不斷，風情媲美南京秦淮河畔。(3) 在大溪建撫墾總局，在臺北沿山的番地推廣種植茶樹，並納徵茶釐以支應撫墾所需。1885 年板橋仕紳林維源率先響應巡撫的計畫，掌管撫墾總局的墾務大臣。1885-1893 年間，大稻埕茶葉外銷逐漸蓬勃，茶葉出口值佔臺灣外銷金額六成以上，1886 年甚至達到 74.9% 的水準。臺茶出口總值大幅增長，在 1880 年代後期幾乎貢獻臺灣出口總值一半以上，直到甲午戰爭末年才衰退到 45% 左右，仍然是當時出口品之冠。風起雲湧之際，臺茶出口量暴增，卻亂了方寸，冒名臺茶或粗製濫造事件層出不窮，當時臺茶正處於興起的階段，劉銘傳巡撫致力於臺灣茶業發展，為了防患弊端，1889 年成立類似茶業進出口同業公會的「茶郊」—茶郊永和興，茶郊宗旨為維護市場秩序、控管烏龍茶葉品質、共同精進技術，另外，仲裁糾紛、對不法業者提出訴訟、並針對製茶職工之疾病、死亡者施予救濟。之後，茶商家數、茶葉市場、茶葉輸出額皆增長。

⁶⁷ 林本源是 1784 年來臺祖先林應寅所傳之家系，非有其人；林維源為林本源家族來臺第四代，臺灣板橋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白石堡吉上社，板橋林家的族長，生父林國華，養父林國芳。他是一位富商、紳士、官吏，曾任太僕寺卿、幫辦台灣撫墾大臣等職。清光緒五年(1879)，林維源協助臺灣防務捐獻軍費 60 萬兩銀，獲光緒皇帝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⁶⁸ 六館街 1892 年完工，林維源進駐後自行創辦建祥茶行，曾一度成為臺灣最大茶行，繳交茶厘以辦理撫墾；另外，劉銘傳巡撫推動臺灣西方教育，也在此街設立學習英文、法文、史地、理化的「西學堂」，它是臺灣第一所官設的新式學校。

伴隨北臺灣茶葉貿易的興盛，李春生決定自營茶葉貿易，將茶葉販賣到南洋和美國等地；由於當時還沒有電燈，後來李春生成立三達石油公司，跨業代理煤油進口，資產迅速積累一舉躍升為富商大賈，茶葉和煤油這兩大行業讓李春生成為大稻埕首富，其富裕程度僅次於板橋林家。光緒 5 年(1879)淡水與竹塹分治，翌年福建巡撫岑毓英(1829-1889)來臺監督臺北府城建城事宜，與時任臺北知府陳星聚(1817-1885)積極著手築城事務，1882 年正式動工，任命李春生與林維源兩位仕紳為臺北城築城委員，監督工程進度，1884 年 11 月在中法戰爭砲火中竣工；李春生出資協助劉銘傳巡撫修復中法戰爭遭法軍摧毀的基隆八堵煤礦，以利臺灣鐵路火車使用。1885 年李春生與林維源共同出資，合營建昌行號，提倡淡水河源流山區種茶，為當時大稻埕最有名的茶商，更是最大的華商茶行。1887 年劉銘傳巡撫將臺灣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設於新落成的臺北城，1889 年李春生與林維源合築建昌、千秋兩街出租給洋商或作為領事館，樓宇煥彩，洋行聚集，茶葉交易熱絡，帶動大稻埕風華，使政經中心由臺南往北移。翌年劉銘傳巡撫為降低臺灣對進口布料的倚賴，籌設蠶桑局，敦請林維源、李春生擔任正副總辦，在五股觀音山區種植桑樹。李春生一生靠著茶葉貿易事業累積雄厚財力，完成許多偉業，大展商業才能外，還熱心公益捐建基隆到新竹間的鐵路、闢建大稻埕商埠(修築淡水河堤防、道路)等公共建設事務，從基隆到臺北的鐵路於光緒 17 年(1891)通車，臺北站就設在六館街南側接近洋人居住區，同年他獲得清廷賞賜「五品同知」官銜及藍翎(以鵝羽製成之禮帽飾品)殊榮。

(二)皇民化教會政策

1895 年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基督教傳道局組成「基督信徒一致會」，1896 年 5 月 27 日派河合 龜輔(1867-1933)牧師來臺北宣教。明治 30 年(1897)，信徒倡議興建第一代大會堂，李春生長老捐獻西門外街約三百坪的土地(西門街外三丁目新起街二丁目，今西門町漢中街)及現金二千圓，再加上由喬治·萊斯里·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與吳威廉牧師(Rev. William Gauld, 1861-1963)帶頭勸募下，得到諸教會與熱心信徒奉獻四千四百餘圓，總募得六千餘圓。禮拜堂於明治 32 年開工，一年後完工，翌年 2 月 20 日舉行獻堂感恩禮拜。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人與日本人之教育規制，採差別待遇和隔離政策，臺灣人子弟就讀公立學校，日本人子弟就讀小學校，後來，殖民當局勵行皇民化政策教會活動也推此一規制。明治 40 年(1907)信徒大會中提議新起街會堂建物建新會堂，李春生長老在幸町捐地又率先捐獻二千圓，在臺灣總督兒玉 源太郎(Kodama Gentarō, 1852-1906)協助籌募建堂基金下，由臺灣總督府首席建築師井手薰(Ide Kaoru, 1879-1944)設計建造，於大正 4 年(1915)2 月 28 日開工，翌年 6 月 28 日竣工，總工程費計四萬八千七百餘圓，即目前堪稱臺灣最具藝術價值、古典堂皇、莊嚴宏偉早期

的基督教建築臺北幸町教會「臺北日本基督教會」：濟南教會大禮拜堂的前身(參見圖 3)。這是一座具有英國維多利亞風格的鄉村紅磚教堂，外觀門窗使用哥德式尖拱(Gothic Ogival)，石雕精美，鐘樓的石雕百葉窗極具特色，日治時期它為日本人專屬的信仰禮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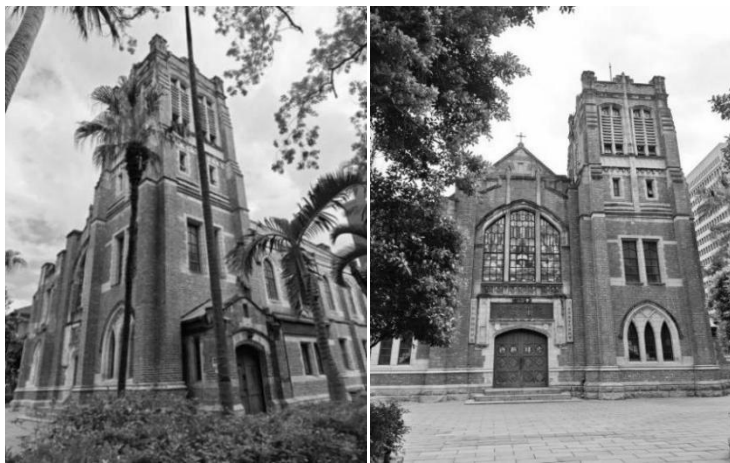


圖 3 濟南教會大禮拜堂正門、側門

圖片來源：作者實地拍攝

註：歷經三次改名：臺北日本基督教會(1896-1916)、幸町教會(1937-1944)、濟南教會(1947~迄今)

1884 年因中法戰爭謠言拆毀大龍峒禮拜堂，1886 年重建改名枋隙禮拜堂(今迪化街大橋教會附近)；1897 年起李春生擔任長老，並負責支付禮拜堂每年度開銷，出任臺北縣參事，1902 年轉任臺北廳參事；大正 2 年(1913)見教會人數日多，一生篤信基督新教的他，為解決臺灣人信仰的禮拜堂需求，提議獨資遷建，親自匠心規劃設計監造，建築雄偉，仿他原鄉廈門禮拜堂，以磚造主體結構，西方教堂圖樣設計，氣派莊嚴，翌年建造完成臺北教會(日新町三丁目，今甘州街)，即今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禮拜堂。

(三)孫中山與李春生的邂逅

1900 年 9 月 28 日孫中山(1866-1925)先生從神戶搭臺南丸經馬關到基隆，進駐臺北，下榻李春生新起町的小洋樓(今長沙街二段)，擬遊說兒玉 源太郎總督支持中國革命及對惠州起義的援助，遭伊藤 博文(Itō Hirobumi, 1841-1909)新內閣禁令未果，11 月 10 日化名「吳仲」搭乘橫濱輪從基隆啟航赴日，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民國 2 年(1913)8 月 5 日，起兵討袁二次革命失敗，中山先生化名「王康賢」偕同胡漢民等人離開上海搭撫順丸到臺灣，秘密停留數天，在總督府衛兵嚴密監控與催促下，僅短暫會晤興中會同志楊心如

與同盟會同志翁俊明、周赤牛等臺籍菁英，8月9日再化名「汪國權」搭信濃丸赴日本神戶，這是中山先生第二次來臺，下榻當時李春生之招待所御成町梅屋敷(今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逸仙公園)，特別一提的是孫中山前兩次在臺期間皆由李春生接待。⁶⁹

李春生六十歲時急流勇退淡出所有事業之後，埋首熱衷於哲學、宗教的研究，曾發表七篇論營臺策略時論，投書香港報刊發表時事評論，出書十二部。李春生志業積極闡揚基督新教長老宗教義，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奠基者。1922年出任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評議員，1924年八十八歲高齡終結他波瀾起伏精采的一生。⁷⁰李春生一生橫跨清朝末期和日本殖民時期的大稻埕紳商，活躍於政經界人物，將福爾摩沙烏龍茶美譽傳播國際，以茶葉貿易致富的買辦，奠定臺茶產業根基，展現實業家、思想家風範，1935年李春生後代子孫李延旭、李延弼、及信徒，為紀念李春生長老捐建李春生紀念教會(今貴德街44號)，如今臺北仍有幾處能夠追憶他的場所。

(四)陳天來：獨具慧眼、開拓南洋、跨足娛樂事業

除了李春生外，另有一號人物見證臺茶發展歷史——錦記茶行⁷¹創辦人陳天來(1872-1939)，同治11年(1872)出生於泉州府南安，年幼隨父親陳澤栗渡海來臺，陳澤栗與李春生同在廈門任職廈門怡記洋行相識。李春生在大稻埕經營茶行，而陳澤栗販賣烘焙茶葉不可或缺の木炭。長兄陳天椿⁷²早逝，身為次男的陳天來(參見圖4)從小就幫忙店

⁶⁹ 1918年5月21日中山先生被迫辭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後，偕胡漢民、戴季陶等，搭乘大阪商輪蘇州丸離粵，經汕頭、臺北、再赴日，一行人於6月7日到臺北，這是孫中山第三次來臺，有此一說，下榻三重文化南路八角樓(樓仔厝)；此次他想跟臺灣同胞演說，喚起民族意識，無奈在日本殖民當局阻撓之下，隔日凌晨搭信濃丸赴日本神戶。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搭乘永豐艦離開廣州，在香港轉搭春洋丸北上上海，15日中山先生寄港基隆未上岸，抱病繼續北上。孫中山雖然只來過臺灣四次，每次停留的時間都不太長，但是對臺灣知識青年的影響非常大。

⁷⁰ 1875年馬偕牧師創立的大龍峒禮拜堂(今延平北路四段與酒泉街附近)，1884年中法戰爭時被拆毀，兩年後重建改名為枋隙禮拜堂。參見李福然，*春風滿堂：李春生逝世100週年紀念特展展覽手冊*。臺北：紅磚堡事業有限公司，2024年。

⁷¹ 周宗武、王惠光，*雙廈記：錦記茶行與周益記古宅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臺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23年。矗立於迪化街附近貴德街73號的陳天來故居——錦記茶行，它為大稻埕茶葉世家，是一間三層豪華洋樓的建物。一樓為一般的商務交易場所，二樓設有屋頂花園及茶商接待室，三樓前方設有公媽廳供祭祀祖先神明的空間，後廂房則為家族居家起居之房間。出身泉州府安溪的周嘉諒(1810-1849)於1846年來到竹塹，在淡水廳衙門旁開設茶泰號商行經營有成；來臺第四代周敏益(1906-1951)為陳天來女婿，因鼻咽癌早逝，他的老家周益記古宅位於竹塹老城區(北門街59號)，氣派山牆，錦記茶行與周益記古宅雙廈，號稱當代臺灣的雙城記。

⁷² 陳澤栗長子陳天椿為臺灣前警備總部總司令陳守山(1921-2009)的祖父。

務耳濡目染生意經，在故鄉泉州府南安接觸到製茶後，光緒 17 年(1891)才十九歲的他識出經營茶行有前景，其父親事業客戶大多為茶廠人員，在茶產業人脈極廣；為了更洞悉茶產業，他專程回茶鄉泉州府南安深入研究茶樹栽植與茶葉加工製造過程，回臺後在大稻埕展現雄才大略創立「錦記茶行」，從事茶葉製造、販售事業，深受英格蘭貿易商約翰·杜特與李春生前輩的薰陶。他開業亦以出口烏龍茶為主，後來受到錫蘭紅茶的影響，轉製作包種茶暢銷中國，還成功開拓南洋茶葉市場，⁷³貿易業務拓展至南洋新加坡、沙勞越、婆羅洲各地，事業大獲成功，也造就大稻埕繁榮與財富。



圖 4 陳天來(1872-1939)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陳天來>

陳天來在經營茶業致富後，因茶葉外銷金額碩大，順勢經營匯兌業務，分別在臺南、廈門設有支店，在上海、香港、神戶設有代理店，事業登上高峰，儼然成為金融大亨。1920 年啟建錦記茶行——陳天來故居(今貴德街 73 號)，1923 年完工，建築物為中西折衷三層洋樓，工法細緻，兼備洋樓與庭園的豪邸；建築體分中央主體與兩側衛塔，主體上有垂花、拖架等裝飾物，還有古典立柱、大拱廊、拱窗等結構與泥塑的雕飾，外觀氣派宏偉，美輪美奐的富商洋樓，堪稱大稻埕第一豪宅。過去是大稻埕茶商固定聚會品茗、眺望淡水河碼頭的招待所，名聞遐邇。茶業大亨陳天來事業蓬勃發展後，將生意觸角延伸到文化教育和娛樂等方面。

1920 年代創設大稻埕幼稚園，投資設立臺北永樂座(又稱永樂戲院，1924 年啟用營業，1960 年歇業)、臺灣第一劇場(臺北第一劇場前身，1969 年發生火災建築體拆除改建

⁷³ 當時在南洋華僑特別偏愛包種茶。有趣的是新加坡或泰國華僑偏愛魏靜時製法低發酵的「南港包種茶」，而印尼華僑偏愛王水錦製法高發酵的「文山包種茶」。

為第一企業中心)⁷⁴、以及臺北蓬萊閣酒家(高級臺菜兼有藝旦表演的酒樓)，跨足教育、休閒娛樂、文化等事業，雖然今已不見其景象，但人們腦海中仍浮現當年熱鬧盛況，象徵當年茶業景氣佳的大稻埕成為商貿繁榮、人文薈萃之地。日本殖民時期，陳天來除 1926 年擔任臺北茶商公會會長、臺灣茶葉雜誌發行人外，並曾任大稻埕壯丁團長、臺北市協議會員、臺北州協議會員等職務，功不可沒。他一生積極遊說政府廢止製茶稅則，減輕茶葉業者的稅金負擔，促進當時茶業的發展；還成功爭取臺灣博覽會分場設在大稻埕，博覽會期間，他主動於南方館設置茶店介紹臺灣茶，有效宣傳開創了臺灣茶銷路，讓福爾摩沙烏龍茶的品牌價值更趨穩固。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遷，大稻埕貿易長期受日商打壓，且淡水河道淤淺致使大稻埕河港功能盡失，南洋華僑抵制日貨，臺茶又不敵錫蘭紅茶的競爭而逐漸沒落，1952 年不幸陳天來家族茶葉產銷業務走入歷史。臺灣光復後，大稻埕持續作為南北貨、中藥、及布帛批發商集中地，同行同業聚集處。

(五)三井新式茶廠 日東紅茶行銷

1896 年日本的三井物產在大稻埕港邊街設立臺北支店，專門經營茶葉、樟腦、稻米、蔗糖等物產出口貿易。⁷⁵1908 年三井物產在海山郡設立海山茶廠，時為東亞最大茶廠，起初茶廠是從事烏龍茶、包種茶生產，後來設立角板山工場改製紅茶；翌年三井家族成立「三井合名會社」，開發臺灣林業資源，並進行大規模茶葉生產，設立三井海山茶廠，為當時東亞最大新式製茶工廠，之後陸續在全臺興建八間大型粗製茶工廠。1912 年殖民當局公布「無薰香包種茶」為最佳製茶法，後來臺灣包種茶製程逐漸由薰香花茶改為無薰香包種茶為主。在 1920 年代之前，烏龍茶一直是臺灣最大的出口茶種，隨著國際間消費者口味的變化，以及 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全球茶葉供需大洗牌，爪哇茶趁機傾銷，事實自 1920 年代起，臺灣烏龍茶出口就已呈現衰退趨勢。

隨著日本本土茶業的蓬勃成長，即使當局鼓勵臺灣人種茶，但前提以不損害日本本土既有利益為原則。日本是綠茶的出口國，在美國市場面對臺灣烏龍茶的競爭，避免影響日本綠茶在美國市場的銷售，臺灣總督府將臺灣發展茶業的重點不鼓吹綠茶、烏龍茶，積極改輔以發展紅茶產業，特別加強紅茶的發展基礎。⁷⁶三井合名會社在殖民政府協助下，1925 年十二月茶葉試驗所引進印度齋浦爾(Jaipuri)、曼尼普里(Manipuri)、及江陽

⁷⁴ 1935 年設立臺灣第一劇場以表演歌舞劇、歌仔戲、京劇、及現代話劇為主。

⁷⁵ 樟腦、茶葉、及蔗糖是清末時期臺灣三大出口商品，有「臺灣三寶」之稱。到了日本殖民時期，樟腦產量更是世界第一，1902-1928 年間臺灣的樟腦產量佔全球 77%，有「樟腦王國」之稱。角板山為當時伐樟製腦集散地，大量樟腦從角板山運送到大溪再轉運到臺北，外銷至世界各地。

⁷⁶ 參見邱顯明，*日治時期臺灣茶葉改良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41。

(Kyang)等阿薩姆大葉茶種，在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今南投魚池)嘗試種植，由於日月潭附近高溫多濕，終年雨量多、地形、及海拔高度等條件，栽培環境恰好與印度阿薩姆茶區相仿，試種紅茶的成效好，儼然臺灣變成日本的大吉嶺；後來也把茶籽分送平鎮茶葉試驗支所、林口庄茶葉傳習所，可惜以失敗收場；1926 年三井設立角板山工場(大溪老茶廠的前身)，⁷⁷引進揉捻機與工業化製茶技術，改良紅茶品質，推動臺灣茶業的規模化與現代化。當時三井合名會社所印製茶袋的照片，係以角板山工場為背景，據傳在會社極盛時期，茶廠區內機器日以繼夜運轉不歇，員工分為三班制，一年約生產 609.63 公噸紅茶；1926 年於南投蓮華池⁷⁸設置苗圃，培育紅茶種苗，1927 年再推出「三井紅茶」，後更名為「日東紅茶」(參見圖 5)展現其雄心企圖；⁷⁹1928 年阿薩姆紅茶樹發芽，採摘後製造紅茶寄送倫敦專家評審，贏得香氣濃厚的評價，奠定魚池茶區為阿薩姆紅茶產區地位。



圖 5 日東紅茶的廣告

圖片來源：<https://www.google.com/search?q=日東紅茶>

(六)臺灣紅茶之父：新井耕吉郎

一生致力推廣臺灣紅茶的人物，我們總會談到一位與臺灣淵源至深的日本農學家新井 耕吉郎(Arai Kōkichirō, 1904-1946)，新井出生於群馬縣利根郡東村(今沼田市利根町)，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部畢業後，大正 15 年(1926)來臺，在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平鎮茶葉試驗支所擔任助手，昭和 5 年(1930)升任技手，1936 年攜家帶眷到南投日月潭協

⁷⁷ 這是一間融合臺、日、英式風格的綠建築，再現百年茶韻風華，是臺灣製茶歷史的縮影。

⁷⁸ 二十世紀初期，蓮華池原名「藥用植物栽培試驗地」(今農業部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當時為藥用植物與紅茶樹栽植試驗的主要研發場所。

⁷⁹ 當時三井合名會社建立之「日東紅茶」(Nittō Black Tea)品牌，「日東」的日語諧音 Nittō，係以全球最大紅茶品牌立頓(Lipton)選字，充分展現其競逐世界紅茶市場的野心。

助成立魚池紅茶試驗支所，以人力墾荒 71 公頃山坡地，大量種植錫蘭紅茶，創建全臺唯一的錫蘭式紅茶廠—「持木製茶廠」。之後，他竭力輔導多家民間會社推廣種植紅茶面積近千公頃；1939 年達到鼎盛期，魚池紅茶園區廣達 3,000 公頃，紅茶外銷量佔臺灣紅茶外銷量達九成三。1941 年 3 月~1945 年 12 月新井技師任支所長，在魚池鄉設立錫蘭式紅茶廠，推廣紅茶種植不遺餘力。當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時，新井將紅茶試驗所研究和製作技術，全盤移交給國民政府的技術人員，由陳為禎擔任支所長。新井 耕吉郎來臺服務將近三十年，對臺灣懷有深厚感情，決定不接受遣返日本而留在臺灣，國民政府續留他擔任技師並協助指導臺灣紅茶試驗研究工作。不幸地，1946 年新井 耕吉郎感染瘧疾在臺灣去世，享年 42 歲，他一生鞠躬盡瘁，奉獻給臺灣的紅茶事業，被譽為臺灣紅茶之父；1949 年紅茶試驗支所員工特別在茶園建紀念碑，尊稱他為貓囃山守護神。1951 年臺灣紅茶成功外銷，的確為臺灣賺取許多外匯，改善了魚池鄉茶農的生活。

臺灣茶葉外銷市場自始就掌握在洋行手中，洋商經由資金借貸與市場網絡操控臺灣茶農茶葉的產銷。1930 年代因紅茶過剩導致價格崩盤，1933 年印度、錫蘭、爪哇等茶葉生產國為控制茶價達成減產協議，簽訂國際茶葉限制輸出協定，由於當時日本未受邀議約，臺灣自不必承擔該協定之約制，迎來大量輸出紅茶的機會，一躍成為臺灣紅茶外銷的主力，促使新竹州跟臺北州的業者加入製茶行列，北埔茶商姜阿新(1901-1982)也是三井合名會社重要的合作對象，爾後紅茶版圖擴及南部與東部，茶園總面積已達 2,909.751 公頃。1934 年全臺 316 家茶廠僅有 40 家生產紅茶，出口量達 3,290 公噸，1937 年全臺 356 家茶廠中有 214 家生產紅茶，足見當時世界對臺灣紅茶需求大增，其中 148 家在新竹州約佔七成，紅茶產量暴增，出口量達 5,800 公噸。⁸⁰昭和 12 年(1937)殖民當局為了防止製茶業者粗製濫造，影響新竹茶業發展，將先前成立的新竹州紅茶同業組合擴大為新竹州製茶同業組合，加入烏龍茶、綠茶等製茶業者。1937 年三井合名會社推出以“Formosa Black Tea”命名紅茶送到倫敦拍賣會，贏得各界好評，奠定臺茶地位；在三井雄厚財力經營下，日東紅茶逐漸崛起，臺灣紅茶出口量超越聞名百年的臺灣烏龍茶，主要銷往英、美等國。

(七)紅茶爺爺：郭少三

提起東邦紅茶郭少三(1908-1998)可謂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是士林望族郭彥邦的長公子，十一歲喪父，十三歲時隨叔叔赴日本求學，就讀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成績優異進東

⁸⁰ 參見湯家鴻，「(NEW)臺灣茶歷史脈絡。」《講茶學院電子報》2019 年 5 月。

網址：<https://teatalkacademy.com/celebrities/13-tang-jia-hong/152-c3offee2019-05>

京帝國大學農化學系，大學畢業時日本教授臨別贈言：臺灣的氣候非常適合茶葉的培育與製造，你回故鄉應該可以朝此方向去努力。少三返臺後謹記師長叮嚀，就讀臺北帝國大學農化研究所，在其恩師山本 亮(Yamamoto Ryo, 1890-1983)教授指導下，研究茶樹的培育、改良、及茶葉製造等學理與技術，從此與茶結下不解之緣。1932 年獲得農業化學博士學位後，目睹日本當局積極推廣紅茶，他認為臺灣茶葉生產必然具有巨大的商機，斷然決定開始自己的茶葉生意，到滇、緬、泰邊境尋找四川原生種的禪種紅茶樹。⁸¹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幸運在清邁北端尋獲，並在山本 亮協助下順利引進茶籽，在埔里鎮郊後湖仔一帶種植，面積近百公頃，1936 年在埔里鎮北門里興建紅茶廠，創立東邦紅茶株式會社生產紅茶。在少三先生學識淵博與縝密經營下，僅數年「東邦紅茶」品牌拓展海內外，外銷英、美、日等地，規模宏大為當時臺灣十大貿易公司之一，輸出紅茶 5,800 公噸的新高峰，創下了臺灣茶業發展史的鼎盛期，不僅賺取大筆外匯，還提供上千人就業機會。⁸²東邦製造的紅茶外觀條索結實，色澤褐黑，白毫特多，果香清雅，韻味醇濃，茶色艷紅清澈，堪與世界頂級的紅茶媲美，郭少三享有「紅茶爺爺」之稱。

1939 年臺灣茶葉臺茶外銷有三類別的茶業：烏龍茶出口量有 2,466 公噸，包種茶 4,286 公噸，紅茶 5,169 公噸，紅茶居首位。1930 年代日月潭紅茶以「臺灣香」為名，在倫敦拍賣會上被名列四大紅茶。1940 年代為臺茶全盛時期，擁有八大茶場，茶園間忙碌的採茶女，花布綠襪交相輝映，織構美麗田園風光。1936 年三井合名會社自農林科獨立出來，成立「日東拓殖農林株式會社」，1942 年公司更名為「三井農林株式會社」，1949 年重組為「日東農林株式會社」。自 1926 年起，包種茶的出口量開始超越烏龍茶，一直維持至 1944 年為止；⁸³1937 年日本佔領華北和東北地區，包種茶順勢銷往這些區域，出口旺盛逐年增加，1944 年出口達到巔峰的 7,346 公噸。⁸⁴到臺灣光復前一年，殖民當局為軍糧所需剷除部分茶園轉作糧食，偏逢美軍定期空襲，臺茶產業極度萎縮，茶園面積縮減為 34,000 公頃，茶葉產量僅剩下 1,192.1 公噸，約為 1939 年產量的十分之一。李梅

⁸¹ 禪種紅茶樹樹性極強，扦插存活率高，抗病蟲害強，抗氧化的多酚類(polyphenols)含量多。

⁸² 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太平洋戰事結束後，日本推廣臺灣紅茶事業，致紅茶事業達高峰期是極具諷刺意味，到 1950-1960 年代，東邦紅茶株式會社雖戮力生產紅茶，但隨後就漸失國際競爭力，慢慢消失於大眾視野中。1980 年後，少三先生患上痛風症，自營茶園縮減，該公司開始減少茶葉生產，改從斯里蘭卡等國家進口紅茶，說實在地，東邦公司是臺灣第一家推出茶飲料的公司。少三先生去世後一年，臺灣發生 921 大地震，茶葉市場崩潰，生產再縮減。後來，隨著魚池鄉紅茶業復甦，東邦重新整治老茶園，至今公司還一貫維持高水準紅茶的製造聲譽。參見須賀 努(Suga Tsutomu)，「台灣茶的歷史を訪ねる 第一回：(1) 埔里の紅茶工場。」交流 No. 913 (2017 年 4 月)：頁 7-10。

⁸³ 參見陳慈玉，*臺北縣茶業發展史*。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頁 30。

⁸⁴ 參見陳慈玉，*同前註*，頁 33-4。

樹(1902-1983)出身殷實商家，1942 年出任三峽街茶葉組合長，推動合作生產、整併茶葉工廠、提倡企業化管理、提高茶葉品質與產量，使得三峽茶葉銷售量大幅躍升。1946 年三峽街改制為三峽鎮，李梅樹被推選為鎮民代表大會主席，1948 年接手三峽鎮農會理事長，改變農會經營模式。

綜上所述，日本殖民時期臺茶主要發展軌跡可歸納為：(1)擴大茶園栽培面積，最盛時期達 45,000 多公頃；(2)推廣優良地方茶葉品種，包括青心烏龍、青心大有、大葉烏龍、硬枝紅心等四大名種；(3)為避免臺灣烏龍茶與日本綠茶競爭，當局改輔以臺灣發展紅茶；(4)成立茶樹栽培試驗場，並積極推展紅茶之產製；⁸⁵ (5)成立臺灣茶檢查所，建立茶葉外銷檢驗制度，維持高品質的紅茶製造，使臺灣紅茶品牌逐漸可以跟印度、錫蘭紅茶分庭抗禮，成為殖民地能夠創匯的主要產業。

五、民國治臺時期(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45~)

1944 年國民政府設置「臺灣調查委員會」研究籌劃接收臺灣事宜，1945 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軍投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八月接收日本政府在臺灣的治權，臺灣走向另一個紀元，展開戰後經濟復甦，歷經一段嚴重的經濟困境與混亂時期，自此臺灣經濟從依附日本轉成附屬中國經濟型態。民國 38 年(1949)國民政府遷臺面臨外交孤立，戰後臺灣民生凋敝，經濟又面臨 1945-9 年間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外匯短缺、物資匱乏、及失業等困窘問題，再加上六十萬國軍所需，以及維持反攻大陸所需的龐大軍費難題；翌年韓戰爆發後，在 1950-1965 年間，中華民國政府總計獲得美國 2,322 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與 1,726 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使得臺灣命運永久改變，經濟迅速復原與穩定。美援終止後，相對基金轉型為「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政府設立委員會，由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行政院主計長擔任委員，臺灣轉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縮寫為 *IBRD*)簽約貸款，政府曾核定臺灣鐵路管理局、中國石油公司所屬各廠礦產煉貸款計畫；不過，隨著臺灣經濟發展迅速，自 1972 年起停止向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縮寫為 *ADB*)貸款，之後轉變成為亞洲開發銀行捐款國之一。

⁸⁵ 受惠於「臺灣製茶株式會社」與「日東拓植農林株式會社」以新式機械和科學方法產製紅茶，有效地降低精製紅茶成本。反觀當時臺灣產製烏龍茶與包種茶仍需仰賴人工手製，成本相對高。

(一)臺灣從管制、美援、到改革

國民政府遷臺後，美方設立「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駐華分署」(簡稱 *ECA* 分署)，我方行政院設立「美援運用委員會」作為對口機構，統籌美援物資的接收、管理、及分配事宜。1954 年 8 月 10 日美國經濟顧問團(Economic Advisory Group)來臺，對於臺灣的財政與金融制度、外匯貿易改革、及管制政策提出建言；同年經濟部尹仲容(1903-1963)部長主張放寬政府管制、扶植勞動密集的輕工業民營企業、推動外匯貿易改革，以加速臺灣經濟發展；他是 1950 年代穩定臺灣經濟、為臺灣經濟「民營化、自由化」打下基礎的關鍵人物，⁸⁶力促臺灣經濟迅速與世界市場接軌，民國 55 年(1966)臺灣「經濟起飛」四字即出自於他之口。1950 年代末期，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擴張，政府有效制定出口導向政策、經濟自由化措施，使得臺灣在 1960 年代後製造業發展成功躍升。

19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全球後進國家人均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DP*)的差異不大，臺灣卻能在數十年間經濟快速成長，1970 年代順利邁開大步進入國際化時代！下列三則專家學者對外援(*foreign aid*)⁸⁷看法迥然不同：

「臺灣經濟成長率能夠到達這麼一個高水準，... 其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點顯然是美援的協助。」(尹仲容, 1961)⁸⁸

「對於任何一個渴望在自由制度下快速進展的國家來說，其經濟政策遠比外援數量的多寡來得重要。」(Jacoby, 1966)⁸⁹

「事實上國防、外交、經濟是息息相關不可分割的，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就無法維持社會穩定，更談不上經濟的發展。」(顏子魁, 1990 年)⁹⁰

⁸⁶ 尹仲容先生被譽為「臺灣經濟領航人」、「臺灣工業之父」。參見(1)葉萬安，*臺灣經濟奇蹟的奠基者：尹仲容*。臺北：天下文化，2023 年。(2)王作榮，*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8 年，頁 10-11。(3)孫震，*臺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4)于宗先，*臺灣經濟發展的困境與出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 年。

⁸⁷ 顏子魁，「美援對中華民國經濟發展之影響。」*問題與研究* 第 29 卷 (1990 年 8 月)：頁 85-98。

⁸⁸ 吳聰敏，「美援與臺灣的高成長。」臺大公共經濟研究中心，2023/04/07。網址：<https://homepage.ntu.edu.tw/~ntut019/te400/bm-T4A-USaid-TEA-2023.pdf>

⁸⁹ 參見 Neil H.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6, p.129.

⁹⁰ 參見顏子魁，*同前註*，1990 年，頁 89。

(二)風雲變色 綠茶崛起

臺灣光復初期，茶葉外銷大幅銳減，南港茶農與工人紛紛轉業，南港茶業為之蕭條，直到 1970 年代以後，茶葉內銷市場蓬勃興起，南港茶農才重拾老本行。1945 年國民政府為復興臺茶，成立臺灣茶業公司，隨後併入臺灣農林公司之下的茶業分公司，積極重建茶園，重整茶葉試驗工作，整頓製茶工廠。1947 年政府實施出口結匯辦法，新臺幣改制，雖讓臺茶經營陷入困境，但美商協和洋行(Hellyer & Co.)盱衡情勢率先來臺設立分公司，在新竹、桃園一帶設立十二間製茶廠，引進中國製茶師製法生產綠茶，成果相當順利。同年 10 月 1 日依據中美經濟援助協定成立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以及兩國合組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為農復會，JCRR)，運用美援的經費與物資，以奠立戰後臺灣經濟堅實的基礎，規定以不超過總撥款十分之一的經費用於「農村復興計畫」，援助內容包含食物與日用品、工業重建、農業復興三方面。戰後日本本土百廢待舉，其主要綠茶產區有待恢復，中國實施共產社會，臺灣綠茶獲得重新發展的契機。1948 年在國民政府輔導與日本殖民基礎的奠基之下，臺灣茶園迅速復耕，茶廠恢復製造，出口又趨於活絡。此時臺灣茶葉外銷以紅茶為大宗，包種茶與綠茶的出口規模較小。1949 年八月農復會遷臺，農復會引導戰後臺灣農業的發展方向，1953~1972 年間連續實施五期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跟「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簡稱經安會)第四組(農業組)相互配合，擬定各期的農業部門生產計畫。農復會有鑑於茶葉為臺灣主要出口物之一，從補助調查生產成本著手，力推復興阿薩姆紅茶、繁殖適於製造上等烏龍綠茶與包種茶之優良在來品種、推廣茶園綠肥、魯冰(*lupinus* 是一種綠肥)、與示範茶園施用石灰窯素之工作、補助農林廳檢驗局向美國購買六種茶葉檢驗儀器。1949 年以後三峽茶區轉變為「產銷分離」的形式，茶農只管種植與採收，製茶則全部交給製茶廠處理，不過，因年輕人大量移向都市，導致今日三峽茶園面積大幅縮減，由 2,500 公頃縮減為 250 公頃，製茶廠家數僅剩個位數。

1950 年代政府成功推行土地改革，臺灣農業興盛，堪稱臺茶的黃金時代，製茶廠增設達五百多家，農復會特別進行茶廠調查與成本調查，以查緝不良製茶廠和探求補助方法；茶苗繁殖與推廣、茶園栽培方法示範、製茶設備提升；協助南投魚池阿薩姆紅茶園恢復至戰前之八百公頃，推廣補助施肥與種植綠肥。1955 年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林公司轉向民營化後，雖擁有魚池鄉九成茶園，但已不再享有壟斷買賣茶菁的權利，茶農可自由販售茶菁給任何製茶廠。翌年農復會為謀提高茶葉單位產量，進行繁殖茶苗更新舊茶園茶株、舉辦優良茶樹栽培方法之示範；1957 年協助平鎮茶葉試驗分所成立示範茶園三十處，推廣茶農採行優良栽培方法。茲因上述農復會輔導績效卓著，1954 年臺灣有 453.5 公噸的紅茶銷售到中南美洲，907.0 公噸的綠茶與包種茶銷售到北非市場，重

新開啟臺灣綠茶的外銷史。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與各地方農會，為了提高臺茶的品質與製茶技術，普設茶葉改良場，專責茶樹品種育種改良、栽培管理、茶園機械化作業、及茶葉研發與技術創新教育推廣。此外，在外商成功領導下，茶業大量的出口產生規模報酬遞增效應。在 1954-1960 年間，綠茶與紅茶已經並列為兩大出口主力茶種；1961 年臺灣阿薩姆紅茶耕種面積達 1,800 多公頃，其中有九成以上分佈在魚池、埔里、水里茶園。196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凍頂烏龍茶成為鹿谷最重要的農特產，茶樹品種則以清心烏龍為大宗，一步一腳印直上雲端，然好景不常；在 1961 年以後，因臺灣紅茶的品質、成本均未能與印度、錫蘭、爪哇產製相提並論，臺灣紅茶逐年淡出出口市場；⁹¹綠茶一枝獨秀成為臺茶出口主力，佔總出口量一半以上。政府從 1950 年代積極扶植紅茶發展，1960 年代起改輔以綠茶出口為主。1965 年臺灣茶葉出口量 20,000 公噸中，紅茶佔 64%，綠茶佔 23%，翌年茶葉出口量 19,000 公噸，紅茶佔 35%，綠茶反過來佔 51%。在 1963-1968 年間，農林廳在花蓮、臺東地區推廣新品種紅茶種植，但成效不彰；1966 年臺灣茶葉出口量達 20,644.5 公噸，但此一登峰造極的出口量，卻也是走下坡的分水嶺，臺灣在 1967 年茶葉出口量降為 19,338.7 公噸，首度從國外進口茶葉且有逐年增長趨勢。⁹²1971 年臺灣茶葉出口量雖還有 21,000 多公噸，但此後就呈下降趨勢，顯示該年為臺灣茶業發展的轉捩點。⁹³

(三)姜阿新：臺灣茶虎、茶金異彩、倏忽即逝

新竹北埔望族後代姜阿新(1901-1982)，字懋熙，1901 年 2 月 19 日出生於新竹廳竹北一堡花草林(今寶山鄉面盆寮)，本姓蔡，入嗣為姜清漢的養子。1915 年畢業於北埔公學校，進入臺北國語學校(即臺北師範學校前身)國語部就讀，畢業後 1919 年前往東京明治大學法政科深造，翌年暑假返家省親，因不捨祖母悲傷而輟學。1932 年偽滿州國成立，對紅茶需求大增，然當時臺產紅茶品質良莠不齊，品質優良的紅茶產量十分有限，姜阿新受聘為竹東郡北埔庄長田中 利七(Tanaka Toshishichi)的助役(秘書)，積極推廣以優良茶

⁹¹ 參見(1)林啟三，*南投縣茶業發展史*。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2)馬有成、陳志昌、王俊昌、莊天賜等人，*茶鄉知道：南投縣茶葉發展史*。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18 年。

⁹² 參見(1)吳中綺，*二十世紀下半期臺灣茶業之探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2)何志峰、林浩鉅、何青儒，「臺灣茶葉產業結構與經營模式的轉變。」*北商學報* 37 (2021 年 1 月)，頁 17 圖 13。(3)徐幸君，*戰後臺灣北部客家茶產業經營性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04-7 表十二。(4)張忠正，「日治時期臺灣茶葉的發展。」*德霖學報* 第二十四期 (2010 年 8 月)：頁 1-20。

⁹³ 參見楊盛勳、阮逸明、廖文如，「臺灣茶葉產銷結構之規劃。」*臺灣茶葉研究彙報* 17 (1998 年 6 月)：頁 95-110。

種擴大茶園種植面積，與日本官員關係良好，生意上與三井農林會社合作無間。1934 年他辭助役一職轉投入地方經濟，斥資在北埔口設紅茶製造工廠生產紅茶，茶廠建坪有八八〇，用電馬力八二，大型揉捻機四部，自動噴霧式發酵室、熱風萎凋室四百坪，為當時全臺最大的製茶廠。⁹⁴昭和 16 年(1941)，姜阿新任竹東茶葉株式會社社長，以彰顯其在茶葉經營上的成功，在竹東地區茶產業持續發揮他的影響力。製茶事業在東京三井農林本社茶葉部長岩倉 一馬(Iwakura Kazuma，日本九州人，東京農業大學畢業)鼎力相輔之下，一帆風順，規模不斷擴大，他先以三星為商標出口著名的北埔茶(Hoppo Tea)，⁹⁵茶葉市場由日本擴及滿州、華北地區。1942 年再成立竹東製茶株式會社販售紅茶、包種茶給三井農林，賺取不少利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臺灣紅茶出口量大約維持在 5,000 公噸左右，一躍成為當時臺茶出口主力之一。然戰爭開啟不久，茶葉市場幾乎喪失殆盡，農林課木村技師指導推薦改營培育杉木事業，設立竹南木行，因戰時物資取得不易，鋼索無處可覓，導致整個伐木工程中斷。1951 年 11 月姜阿新參選第一屆臺灣省議會議員，他還支援早期在日本求學後到滿洲國經商，戰後回到桃園楊梅具有豐富中國經驗的客籍人士張芳燮(1914-1994)參選，雖然雙雙當選，但姜阿新債額遽增。姜阿新事業多元遍及茶業、糖業、林業、交通業等，經營不善轉向民間高利借貸，導致事業頹敗。1952 年茶業獲利有限，債務利息負擔逐日加重，儘管大量裁員、出讓生產器具、出售田地、轉讓新竹客運股權、釋出竹南木行經營權，皆無濟於事，無法挽回頹勢。厄運纏身，諸事不順，在姜阿新試圖打開洋菇外銷市場之際，1965 年其洋菇出口事業跟隨著永光公司因債務纏身而陷入空前逆境。

臺灣光復後，姜阿新的茶業處於半休業狀態，伐木業尚未就緒。二次大戰使得南洋產地茶園長期荒廢，恢復曠日費時，歐美茶業市場需求甚殷，臺灣出現茶業黃金時刻。省營臺灣農林公司茶業分公司接收多家日產企業，卻因外行管理不善，令人側目。此刻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臺北分公司總經理伯納德·歐內斯特·鮑魯頓(Bernard Ernest Bolton, 1908-1996)親自登門尋求姜阿新合作商機，姜阿新二話不說應允茶廠全力產茶外，1946 年「竹東製茶株式會社」與「竹東農業興業株式會社」合併

⁹⁴ 參見廖運潘，*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 年，頁 77，120-1。

⁹⁵ 北埔茶以「膨風茶」(Pun Fuen Tea)聞名，別名「東方美人茶」、「椶風茶」，為臺灣烏龍茶類中的極品。相傳英商怡和洋行將此茶獻給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茶葉沖泡在水晶杯中，外觀形如絕色美人曼舞，女王品嚐後讚不絕口，賜名為「東方美人茶」(Oriental Beauty Tea)。當時英國上流社會視之如珍寶，造成臺灣的膨風茶輸出到英國逐年遞增。

為永光股份有限公司，在臺北和竹南設兩家分公司，在二重埔建製茶廠供應直接出口，先將北埔粗製廠改設為精製茶廠，另外在北埔再建一間全省規模最大之粗製茶廠。他大力推出「永光紅茶」外銷，茶葉大都銷往香港怡和洋行、日本三井集團，其茶葉出口量曾佔全臺三成多，捲起茶界姜阿新旋風，在世界上大放異彩，進入「茶金時代」；當時勞工成本相對較為高昂，茶金著著實實是在賺戰後復甦財，說白了，是全球市場紅茶供不應求所致。

永光公司能夠在戰後茶業界獨占鰲頭，仰賴日本殖民時期與英商怡和洋行的合作關係，以及對茶菁品質的重視，再加上公司縝密周全的加工製程，其他茶廠望塵莫及，姜阿新獲利可觀，族人紛表讚揚傳為佳話，享有「臺灣茶虎」的美譽。⁹⁶然而，1950 年代南洋茶產地復原產量超越臺茶，工資低廉，茶製品色、香、味俱佳，致使臺灣紅茶市場外銷前途黯淡，⁹⁷倏忽即逝的茶金時代瞬間變成茶土時代。屋漏偏逢連夜雨，戰後國民政府卻採放任政策，濫發茶廠許可證，致使茶廠一下子由一百家增為三百家，既惡性競爭，且茶葉品質要求不高，臺茶市場產生了葛雷欣法則(Gresham's Law)，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1960 年之後，臺灣紅茶在世界茶市銷聲匿跡，北埔茶商標 Hoppo Tea 不再出現倫敦市場，臺灣紅茶似乎成為夢幻中名詞了。

肆、結語

在過去三百多年中，臺灣經歷了不同的時期(荷蘭、明鄭、清廷、日本、中華民國)，也在不同時期發展出不同類別的臺茶(烏龍茶、包種茶、紅茶、綠茶)，⁹⁸外銷到世界各地。康熙 61 年(1722)派遣巡臺御史黃叔璥抵台後，巡視各地，著有專書，明確記載漢人通事

⁹⁶ 姜阿新事業版圖由於擴充太快，經營多元事業，所託非人，導致事業周轉不靈，1965 年宣告破產，各奔前程。參見廖運潘，*前揭書*，2021 年，頁 287-8。這是一部由客家望族的故事，反映臺灣經濟起飛前後的政經、文化、及人性的好書，它也為臺灣茶業史作了最佳註腳。2021 年公視曾以此為題材拍了一部全劇十二集的時代生活劇：茶金。

⁹⁷ 依據日本茶業要覽的統計：1933-37 年五年平均產茶國單位面積一公頃的茶葉產量，日本為 2,658 磅、印度 1,178 磅、錫蘭 1,041 磅、爪哇 1,413 磅、臺灣茶生產力最低僅有 575 磅，惟中國的茶生產力資料闕如。參見廖運潘，*前揭書*，2021 年，頁 145。

⁹⁸ 包種茶與烏龍茶同屬半發酵茶，前者為條形茶，而後者為球型茶；至於綠茶、包種茶、及烏龍茶不同之處，在於綠茶在茶葉片採栽下來即開始蒸菁炒菁，過程中完全不發酵，包種茶俗稱清茶，常被誤認為綠茶的一種，其實兩者不相同；凍頂烏龍、高山茶都是半球型包種茶，俗稱烏龍茶。在上述的茶類外，以臺灣原生種山茶製作的白茶，茶樹的芽被採摘後自然展開，除去茶葉中的大部分水分，製作工藝最為簡單，發酵程度僅 2%，不撚揉搓，不加熱殺青，經過萎凋和乾燥程序後，即可成為白茶的雛形，咖啡因含量極低，為一種溫和消暑的新研發茶品。阿里山佳葉龍茶(Gaba tea)富有有超高含量 γ -基丁酸，咖啡因極少帶有清雅果香，紓壓又提升元氣的功效茶。

請原住民入山採茶焙製事宜；道光年間(1821-1850)，臺灣開始大規模種茶，且已經開始製茶，只不過當時臺茶係以混福建茶方式出口；咸豐 5 年(1855)，林鳳池從武夷山引進三十六株青心烏龍茶苗，植於南投鹿谷凍頂村，製茶技術亦源自閩南，此為臺灣烏龍茶之起源，它不同於三角湧、大嵙崁、大稻埕，鹿谷茶葉貿易並非倚賴開港通商而興起。咸豐年間(1851-1861)，臺茶發展伊始，製茶種類僅臺灣獨特之烏龍茶一品種而已；同治 5 年(1865)臺茶出口量已有 82 公噸多，為臺茶出口元年。1868 年杜特於艋舺設立精製茶廠，首創臺灣本土精製茶廠，引進福州、廈門技工精製烏龍茶，收購供應外銷的茗茶，使臺灣茶葉生產大躍進，對臺茶業發展貢獻非凡；1869 年寶順洋行將精製完成的臺茶銷往紐約，成功開啟臺茶的外銷市場，臺茶品牌“Formosa Oolong Tea”由此享譽國際。1870 年代大稻埕到處林立迴廊式建築的洋樓，醒目特色頗多；⁹⁹坐落在淡水河小支流港仔溝兩畔或離河岸碼頭稍遠的茶葉貿易建築立面有垂花、拖架等裝飾物，使用紅磚與米黃色呷哩岸石條，古典方柱與圓柱並用，大小拱相間出現，講究整體設計風格、氣派，宅、商、廠混用，底樓為茶廠，因應氣候與製茶需要設有騎樓，供撥弄堆滿茶葉的筴笠、挑除毛茶的茶枝跟壞葉作業場所。

清廷為了對付鄭成功的海軍，嚴格實施海禁管制，致使當時從福建沿海茶葉的轉口貿易幾乎完全停止。十七世紀中葉起，荷蘭積極從事茶葉貿易，臺灣則扮演中國茶的轉運集散地角色；荷蘭殖民治臺期間從福建、廣東招引漢人來臺發展農業(稻米、茶葉、及蔗糖)，且引進豌豆、馬鈴薯、蕃茄、玉米、蓮霧、印度椪果、南美釋迦、茴香等農作物，由漢人負責種植作物，原住民負責打獵，荷蘭人負責收購，此時臺茶多以混福建茶方式進行出口貿易。日本殖民時期制定「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發展方針，對臺茶發展進行縝密的計畫，先後頒布「臺灣製茶稅則」、「臺灣製茶稅則施行細則」、「臺灣茶業取締規則」、「臺灣茶檢查規則」等規定，使得臺灣茶業步入正軌發展；沒想到陰錯陽差，當局為避免臺灣烏龍茶與日本綠茶競爭，改輔以臺灣發展紅茶。自從日本發動太平洋戰事起，臺茶出口由紅茶微轉為綠茶，在臺灣光復後，臺茶外銷仍以紅茶為大宗，包種茶與綠茶的出口規模相對較小。戰後因日本本土百廢待舉，主要綠茶產區有待恢復，中國大陸實施共產社會，臺灣綠茶獲得重新啟動發展的契機。在 1954-1960 年間，綠茶與紅茶已經並列為臺茶兩大出口主力茶種；自 1961 年以後，因臺灣紅茶的品質、成本優勢漸失，紅茶逐年淡出臺灣的出口市場，綠茶一枝獨秀成為臺茶出口的主力，佔總出口量一半以上。

⁹⁹ 其中有一間浪漫情調的洋樓坐落在基隆河畔臺北市美術館旁的臺北故事館原來是「圓山別莊」，主人翁就是曾擔任臺北茶商公會幹事長的大稻埕茶商永裕茶行老闆陳朝駿(1886-1923)。

一、臺灣經濟起飛 臺茶轉內銷發展

1966 年臺灣茶葉出口量達 20,644.5 公噸，但此一登峰造極的出口量，卻也是走下坡的分水嶺，臺灣在 1967 年臺灣茶葉出口量降為 19,338.7 公噸，首度從國外進口茶葉且有逐年增長趨勢。到了 1970 年代，由於臺灣工業化的發展，茶葉外銷已非臺灣主要的外匯來源，且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一) 19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東南亞因戰亂，臺茶外銷嚴重受挫，部分茶農兼種其他作物，茶園面積縮減；(二) 中國歷經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茶葉出口量一時間不能恢復；(三) 印度和斯里蘭卡¹⁰⁰人口快速增長，茶葉內需轉強，進而削弱出口能力；(四) 1971 年以後，隨著臺灣逐步進入工業化社會，工資高漲、農村勞動力外移等問題漸漸浮現，政府推廣各地特色茶，臺茶轉向內銷市場為主，產量僅佔世界百分之一。¹⁰¹(五) 1971 年以後，隨著臺灣國民所得提高，從以前純粹以茶會友的飲茶(傳統功夫茶、老人茶的印象)，茶藝館林立轉型為茶藝文化的茶會，強調茶藝美學與主題的展現。

二、總結：臺灣茶產業的發展與轉型

縱觀三百多年臺灣茶業發展史，本文歸納總結：(一) 三峽茶業史兩百多年，先祖輩從福建安溪到三峽，始作龍井茶；1937 年在三井財團積極經營之下，曾以“Formosa Black Tea”揚名世界；自 1970 年代改作包種茶，茶園面積由輝煌時期 2,500 公頃縮減至今 250 公頃左右，後又因三峽包種茶價格不如坪林，再度改推碧螺春綠茶。¹⁰²不過，也有許多人認為南投縣茶業史亦有兩百多年，「茶鄉南投，南投茶香」，南投才是臺灣茶葉之鄉。臺茶生產總面積約 1.2 萬多公頃，年產量約 1.4 萬多公噸，其中南投縣就有 6,000 多公頃，佔全臺茶葉產量五成以上；南投縣茶葉種植面積廣大，種類多樣，來自阿薩姆「印度大葉種」集中在魚池鄉日月潭茶區，來自武夷「中國小葉種」集中在竹山鎮杉林溪茶區、民間鄉松柏嶺茶區；在臺茶產業鏈中，南投不論是平價的量產茶或高價的高山茶，皆佔

¹⁰⁰ 錫蘭(Ceylon)於 1972 年改稱為斯里蘭卡(Sri Lanka)。

¹⁰¹ 參見陳大中，「見證臺灣經濟轉型『茶金』餘暉中的臺灣茶業發展。」《農傳媒》2021/12/24。據姜阿新女婿廖運潘的轉述，從戰前的 1930 年代到戰後這段茶金時代，臺茶單位面積產量都約在每公頃 0.2 多公噸，若跟印度、錫蘭、爪哇等地——「南洋茶」生產力每公頃皆維持在 0.4~0.5 公噸以上相比，臺茶絕對是缺乏市場競爭力，但 1970-1980 年間臺茶出口量尚保持在 3,000 公噸左右。網址：<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70760>

¹⁰² 參見范雅均，「全台歷史最悠久的農會，三峽四季產好茶，細說三角湧烽火茶金 122 年。」《微笑臺灣》2022 年 6 月 4 日。網址：<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5519>

有不可忽視的地位。¹⁰³鑑古知今，似乎可從三峽或南投茶業發展直接話臺灣茶業滄桑史。(二) 在臺茶發展過程中，政府在茶葉產業發展扮演角色，民間出現七位響叮噠的關鍵人物：英商約翰·杜特、李春生、魏靜時、新井 耕吉郎、郭少三、陳天來、姜阿新七人。前兩位為臺灣烏龍茶之父，第三、四位分別是臺灣包種茶之父和臺灣紅茶之父，第五位為家喻戶曉的紅茶爺爺，後兩位都是經營茶葉貿易致富的仕紳。他們對臺茶發展及茶葉貿易貢獻匪淺，特以「白茶清歡無別事，我在等風也等你；苦酒折柳今相離，無風無月也無你。」詩句，表達對七位古人的深深回憶與思念。如今當我們逛臺北年貨大街，瞥然塵念此際暫生在這些悠久茶葉貿易建築、騎樓特色、及歷史長河中。(三) 臺茶的回顧與展望，荷蘭殖民時期臺茶為萌芽期，明鄭時期臺茶為停頓期，清廷時期臺茶為發展期，日本殖民時期臺茶為蓬勃期，民國時期臺茶進入興盛期，至於臺灣步入工業化後臺茶為挑戰期。

參考文獻

- 池上 麻由子著，連雪雅譯述，*窮究臺灣茶：如何選購、享受臺灣茶*。臺北：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 杜特(John Dodd)著，歐尼基(Niki J. P. Alsford)編著，王若萱、李鎧揚、魏逸瑩、黃靚任合譯，*寶順洋行：杜特在淡水的見證*。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22 年。
- 何志峰、林浩鉅、何青儒，「臺灣茶葉產業結構與經營模式的轉變。」*北商學報* 第 37 期 (2021 年 1 月)：頁 1-25。
- 沈勇強、孫銘源、周富三，「臺灣山茶研究史。」*林業研究專訊* 22 卷 (2015 年 8 月)：頁 50-2。
- 李福然，*春風滿堂：李春生逝世 100 週年紀念特展展覽手冊*。臺北：紅磚堡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
- 吳聰敏，「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看荷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經營之績效。」*經濟論文叢刊* 第 44 卷 (2016 年 9 月)：頁 379-412。
- 林啟三，*南投縣茶業發展史*。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
-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第二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年。
- 馬有成、陳志昌、王俊昌、莊天賜等人，*茶鄉知道：南投縣茶葉發展史*。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18 年。
- 徐逸鴻，*圖說清代臺北城*。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1 年。

¹⁰³ 參見呂慧珠，「2020 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國家文化記憶庫*，2020 年。
網址：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Event&id=600155

陳右人，「臺灣茶業之回顧與展望。」刊載于園藝產業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專集（頁 127-46）。臺北：臺大園藝系，2006 年。

陳慈玉，臺北縣茶業發展史。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

陳嘉式，「李春生傳略：一段幾乎被遺忘的臺灣歷史人物。」太平洋時報 2013 年 1 月 4 日。

網址：<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Li/Li，CSeng/biog/Tan，Ksek.htm>

張忠正，「日治時期臺灣茶葉的發展。」德霖學報 第二十四期（2010 年 8 月）：頁 1-20。

張遵倩，「清末臺灣茶葉的發展。」德霖學報 第二十四期（2010 年 8 月）：頁 295-318。

黃怡嘉主編，臺灣茶事。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17 年。

湯家鴻，「(NEW)臺灣茶歷史脈絡。」講茶學院電子報 2019 年 5 月。

網址：<https://teatalkacademy.com/celebrities/13-tang-jia-hong/152-c3offee2019-05>

楊盛勳、阮逸明、廖文如，「臺灣茶葉產銷結構之規劃。」臺灣茶葉研究彙報 17（1998 年 6 月）：頁 95-110。

穆道朗，臺茶輸出百年簡史。臺北：臺灣茶輸出業同業公會，1965 年。

廖運潘，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 年。

謝明妃，從臺灣茶葉外銷起落探討茶業之發展與未來。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